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12月31日第32期 总第210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10期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专辑（二）

目录

【专稿】

谭天荣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大革命 2-21

【序跋】

李 锐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 22-23

【评论】

启 之 黎澍的发现
——马恩没有说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24-27

【文摘】

王若水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27-53

李洪林 四十三年成一梦，劫后空余百创身
——谈马克思主义哲学 53-61

何 方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 61-67

张宣三 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 68-72

余 孚 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 73-77

【域外之声】

史傅德（Fred E. Schrader）寻找真实的马克思 77-85

【读者来信】

郜熊谈冯克之误 85-86

【本刊声明】

【专稿】



作者简介：

谭天荣，1935年出生，湖南湘乡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毛泽东封为“学生领袖”。1958年11月被收容“劳动教养”，1969年11月因“战略疏散”遣送回湖南湘乡。1978年“右派”改正。同年冬，被分派到湘潭师专任教。1986年任青岛大学物理系教授至退休。著有《哥本哈根迷误》（陕西科技出版社，1988）、《揭开EPR关联之谜》（天津科技出版社，1995）、《评波普尔哲学》（自印）等。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大革命

谭天荣

有人说，“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也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果真如此吗？本文将考察这一问题。

一、新中国与波拿巴主义

说到1949年的中国革命，我们劈头遇到了如下问题：这次革命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我的结论是：她是一个红色波拿巴主义的政权。

对于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的特征，马克思作了如下描述：第一，小块土地所有制。这是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第二，一大群豪华富贵的官僚。形成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第三，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第四，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如果说对于前苏联，值得怀疑的是布尔什

维克的政权有没有这些特征，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值得怀疑的却是：“难道别的国家不是这样吗？”小块土地所有制？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新中国成立时也是如此。合作化，成立人民公社，那是以后的事。改革开放的第一件事就是实际上恢复小块土地所有制。一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当官的富贵豪华，自古如此，天经地义，要不人家干嘛一个个都死乞白赖要当官呢？教士的统治？这一点倒是没见过！但我们有政工干部，其职能与教士该差不多吧！军队占压倒的优势？这就更不必说了！中国的中老年人，谁不记得“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震天口号呢？

总之，要我们中国人相信中国有波拿巴主义的这四个特征并不困难，但要中国人相信世界上还有不具有这四个特征的地方倒是一件难事了。

要克服这一困难，就必须把中国和一个非“波拿巴主义”的国家比较，比如说，和一个议会制的西方国家比较。对于这样的国家，立法权利属于“议会”，行政权力属于“内阁”，糟糕的是，我们似乎也有类似的机构，但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议会”与“内阁”这些似是而非的名称只有使我们误入歧途，还是从另一角度考虑问题吧！

一般地说，西方国家没有小块土地所有制，没有教士的统治，军队也没有压倒的优势。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的区别在于“官僚的地位”问题。

关于官僚在当年法国的地位，马克思写道：“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然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从而官僚达到了个人专制）。”

一般地说，对于先进的西方国家，官僚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对于波拿巴主义的国家，官僚自己就是统治者。

对于中国，官僚自古以来就是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的工具，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是今天的所谓“官本位”的源头。“官本位”这一用语虽然古怪，但每个中国人都十分熟悉，

谁都可以信手拈来举出一大堆例子。例如接待一位外国专家时，我们关心的是他是一个什么官，至于他有什么学术成果，职称是什么，则较少关心。还有，在一所我曾经呆过的学校，有些教师业务跟不上，改做行政工作，成了行政干部，大小也是一个官。后来，无论是在工资方面，住房方面，还是其他福利待遇方面，这些人都越来越优于在职教师。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为“福利向行政人员倾斜”。

在中国，“官本位”表现出波拿巴主义最明显的特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还是中国人最难以理解波拿巴主义，原因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然而，本文所考察的，不是“官本位”这一波拿巴主义最明显的特征，而是一个不能为“波拿巴主义”这一范畴所概括的历史现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说在中国，没有一个人会对“官本位”感到困惑，那么对于文化大革命，却还是有不少人也感到难以理解。“革命吞食自己的儿女”自古有之，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情况：革命对自己的儿女“一个也不放过”毕竟还是一种新现象。

二、新中国历史的初始条件

新中国的历史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按照世界历史的共同规律展开的。

为了描述这一段历史，首先要考察它的初始社会状态。

新中国成立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经历了多年战乱（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之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空前洗劫，中国的民众变得极为羸弱而迟钝。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却在战火中锻炼了自己，变得极为强大和灵活。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有如一盘散沙的民众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机体彼此相遇并且在相互作用中迅速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自古以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在中国占着重要的地位。上述初始条件使得这一矛盾对于新中国更加突

出。

第二，正如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所说，当时中国只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工业经济，此外的大约90%左右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与古代没有多大区别。这就是新中国的初始社会状态：一些多少现代化了的工业小岛散布在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上，新中国将走向何方呢？因为大工厂几乎都在城市，毛泽东这里说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可等同于“城市经济”，而古代的经济则等同于“乡村经济”。如果把当时的乡村隔离起来，即假定占10%的城市经济根本不存在，那么在这个古代的经济基础上，将长出一个古代的上层建筑；反过来，如果把城市隔离起来，即假定占90%的乡村经济不存在，那么，这些经过民主革命的现代城市，根据当年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代表现代性的城市经济的政党领导下将会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当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要求建立一个与古代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古代的上层建筑；而现代化了的城市则要求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的的基本矛盾，这是古今中外无处不在的城乡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新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展开。

毛泽东自1949年以后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袖，他既是城市居民的领袖，也是乡村居民的领袖。作为城市居民的领袖，他的历史使命是按照马克思的蓝图，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乡村居民的领袖，他的历史使命却是在中国建成一个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一个新世纪的“秦始皇”和一个“在暴君统治下人人平等”的庶民社会。既然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处在相互作用之中，这两种相互排斥的历史使命不免相互渗透。于是，新中国的社会的的基本矛盾就反映在伟人毛泽东身上，表现为他的“思想状况”的矛盾：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暴君。当毛泽东说 he 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时，或许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其中有如此深刻的含义哩！

三、小农的王朝

因为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有了现代化的城市，从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经济基础的土壤上自然长出来的国家形式，就不同于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它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形式呢？在世界历史中曾经有过两个先例，一个是20世纪俄国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形式，另一个是19世纪法国的拿破仑主义的国家形式。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在铲除旧社会的不平等之后，国家（表现为一个“暴君”）通过机关和军队直接对社会进行统治。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政治特征现在被统称为“个人崇拜”。迄今为止，为什么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会产生个人崇拜，仍是20世纪历史最大的不解之谜。至于拿破仑主义，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下面简称《波拿巴》）一文刚好对它作过详尽的考察。在法国历史上，拿破仑主义国家即“波拿巴王朝”。马克思在该文中指出：“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家族曾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家族曾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家族乃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考察的是19世纪中叶的法国，乡村的政治影响毕竟不如城市。代表乡村社会关系的“第二帝国”之所以能够建立，乃是由于城市的各敌对阶级暂时达到了势均力敌，刚好让“第二个波拿巴”钻了空子。但在新中国，乡村经济本来就占绝对优势，再加上土地改革使乡村居民一度变成了“耕者有其田”的小农，激活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乡村的政治影响一开始就大大超过城市。由此可以断言，新中国即将建立的“小农的王朝”将比19世纪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更接近于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

那么，“小农的王朝”究竟是什么样的王朝呢？在《波拿巴》一文中马克思写道：“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藉以立足的适当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所有一切关系和个人齐一的水平。因此，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同样的群众在一切方面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着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

所以它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及其直属机关的各方面的直接干涉。”这里，马克思指出小农的王朝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藉以立足的适当基地。在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在这一基地上很快就转化成为自我服务的大官小吏，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政党转化成为一个排他性的利益集团——权力贵族。同时，马克思又指出：小农的经济地位使得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这里，马克思指出小农的王朝要求有一个权力无限的最高主宰。在新中国，这一要求通过各种途径把中南海的主人——“伟大领袖”毛泽东——实际上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虽然，和袁世凯不同，他没有龙袍，也不需要龙袍。

下文考察小农的王朝的这两个要求在新中国实现的过程。

四、新中国的干部与群众

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政府构架基本上模仿苏联，而那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发动土地改革，改造工商业时，人们（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在内）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在按照马克思的蓝图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然而，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借以实现的基础——现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却并未随着这一声炮响送过来。考虑到这点，就不必惊讶共产党政策的实际社会效果远远偏离了“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新社会”这一目标。

新中国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但是，即使不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仅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出发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会因此而消失。要在新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就得发展现代工业，就得有社会分工，应用科学技术，由此而需要各种不同才能的人才，就会形成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作为这一

切的必然结果，就会形成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然而，要认识新中国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还原当时的历史。

按照官方的说法，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土地、在土改复查中被没收了所有浮财的地主，仍然还是地主；不仅如此，他们的子女、子女的子女，世世代代仍是“地主阶级出身”，受到和地主一样的政治待遇。而事实上，“土改”之后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地位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这两类人的区别仅在于历史。至于地主子女和农民子女的区别则仅在于血统。在世界历史上，“阶级”是按经济情况划分的，只有“种姓”才按血统划分。因此，土改之后“地主”这一称谓不再是指一个阶级，而是指一个种姓了。而新中国自1949年以后的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种姓迫害”。这种冒称“阶级斗争”的种姓迫害，一直掩盖着真正的阶级压迫与剥削。另一方面，这种荒谬的种姓迫害，还使得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名声狼藉。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实践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然而，在这一时期，真正的阶级压迫与剥削本身也是隐蔽的。首先，在完成“三大改造”之后，从小商店的店员到大厂矿的经理，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火车司机到交通部长，都是国家的“干部”，即官僚和职员。在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官僚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并未单独构成一个阶级。但对于像中国这样农民占优势的国家，情况怎样呢？

马克思在《波拿巴》中曾这样论述上世的法国官僚：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期，官僚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在上述所有时期，官僚虽然都力求达到了个人专制，但只有到了“第二共和国”时期，由于城市中相互对立的各个阶级一时间势均力敌，乡村的社会关系暂时占了优势，官僚们的这一目的终于实现了，他们本人成了统治者。

由此可见，官僚本人成为统治者乃是乡村的社会关系的特征。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乡村的社会关系一直处于优势，因此官僚本身一直都是统治者。在这里，官僚与农民乃是乡村社会关系的两个方面，既与资产阶级相对立，也与无产阶级相对立。在这种意义下，

“第二个波拿巴”和他的同僚乃是当时法国农民的代表。但是，第二帝国的“一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作为农民的代表者，并不是农民领袖或农民在议会中的代表，他们组成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大多出身于农民，在建国之前，他们在乡村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进城”之后，由于地位的改变，由于乡村的政治影响，他们很快形成“一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但是似乎不能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这是因为，在法兰西“第二帝国”，除了官僚这个“人为等级”之外，还有一个由社会各真实阶级构成的公民社会。但是在新中国，原有社会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已经被干部等级制度所吞并。除了“干部”，社会上就只剩下市民和农民了，而这些居民则被称为“群众”。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说新中国的基本阶级结构就是“干部”与“群众”的两极对立，其中的一极是“富贵豪华的官僚”，即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另一极则是极端贫困与无权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工人、知识分子、市民、一般干部（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就成了两极对立的中间阶层，这种社会结构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最纯粹、最极端的形式。

五、新中国的农民与工人

人们说，1949年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原是摆脱封建桎梏、铲除封建不平等、建立资产阶级法治社会。而1949年革命的结果却与此背道而驰：它建立的干部等级制度把旧社会的剥削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以新的形式固定下来，让大批干部有旧社会剥削者的收益而没有旧社会剥削者的劳累与风险；它建立的“阶级成份”制度把印度那种按血统定尊卑贵贱的种姓制度移植过来，将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以及后来的“右派”等强行划为“不可接触的贱民”。这一切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铲除的“封建不

平等”。然而，更致命的“封建不平等”还是由户口管理制度维持的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正是新中国的阶级压迫与剥削的基本特征。

阶级压迫与剥削总对应于一定的剩余价值形式。如果说，佃农的剩余价值形式是“地租”，自耕农的剩余价值形式是“赋税”，那么，什么是新中国的农民的剩余价值形式呢？新中国的农民也交农业税，但那并不是主要的剩余价值形式；对于他们，主要的剩余价值形式是“征购”。1953年底，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必须把“余粮”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显然，只有统购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时，统购才是必要的。那么，对于小农来说，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又是由什么来决定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小农集小地主、小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于一身，作为小地主，没有地租他也得种地，作为小资本家，没有利润他也得种地，只要他能付给自己作为农业工人的工资。换句话说，只要他还能活命，他就会去种地。因此，“他们的剩余劳动的一部份白白地送给了社会，它既不参与生产价格的调节，也不参与一般价值的形成”。这就是说，即使农民按市场价格出售粮食，他们也就刚刚能活命。现在强迫农民按更低的价格出售，试问把农民置于何地？在新中国，人们已经接受了一种特殊的语言。例如，吃面包喝牛奶的洋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吃糠咽菜长大的中国乡村孩子则“生活在蜜罐里”。早在1953年，乡村居民就已经进入“蜜罐”了。接着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在这次运动中失去了土地、耕牛和农具，得到了一副锁链。对此，农民虽然不满，还得敲锣打鼓表示欢迎。

乡村的变化引起了城市相应的变化：与粮食的荒谬低价对应的是工业品的荒谬高价。这种荒谬的价格不仅导致种种荒谬的社会现象，还导致一种荒谬的理论：“一个工人一年创造一亿人民币的价值，而一个农民一年只创造几百万的价值。”马克思的不肖子孙竟然忘记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荒谬的价格政策使得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乡村居民，为了防止由此而引起的劳动力的流动，就实行了“户口管理制度”。这一制度赋予城市居民种种特权，让城市居民天生高贵而乡村居民天生低贱。

城乡差距使得“下放农村”成为一种政治惩罚手段。仅仅是面临“下放农村”的万丈深渊，就足以使每一个城市居民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新政权利用工人阶级对享受特权的感恩和对失去特权的恐惧，把它收编成自己的“近卫军”，在历次运动中用来恫吓、压制和攻击知识分子和其它各种不够“驯服”的人。新中国的御用工人阶级被动地写下了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六、群众运动

世界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即使有某种不平等也可以建立法制。在古罗马帝国，虽然有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不平等，罗马法还是保障了自由民内部的平等。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各蓄奴州，虽然有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当时的美国宪法还是保障了白人内部的平等。那么，能不能想象在新中国荒谬的种姓制度和户口管理制度下，把某些人划为“人民”而把另一些人划为“敌人”，再制定某种保障“人民内部”的平等的法制呢？不可能！

1949年的革命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根据当年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它建立的却只能是一个小农的王朝。这个王朝只可能是一个“人治”的古代国家，而不可能是一个法制的现代国家。此外，新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运动”的偏爱——更使得任何法制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中国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打下的天下，自然对群众运动情有独钟。它依靠“人民公社运动”来“改变生产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再现了堪与安徒生《皇帝的新衣》媲美的童话；它依靠“大跃进运动”来“发展生产力”，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与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迥然异趣的滑稽剧。然而，中国共产党最得心应手的还是靠群众运动来铲除异己。这种群众运动的典型程序是揭发、批斗、处理三步曲：

第一步，先动员群众相互检举揭发，其内容往往是私下谈话和私人信件。私下谈话无据可查，真假难分。运动的领导人为了动员群众，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自然“宁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无。”私人信件虽然白纸黑字，但怎么解释却可随心所欲。

第二步是“批斗”，在这一阶段，一部份群众被指定作为“批斗”运动的对象。对这一部份群众来说，他们的罪行早就由“上面”预先给定，有没有事实依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群众“批斗”时要“体会领导意图”。不必担心有人会辩解，被批斗的人唯一的权利是不分皂白地“承认”。也不必担心有人会提出异议，因为谁提出异议谁就会立刻成为运动的对象。对于运动的领导来说，不论批斗怎样离谱，支持批斗就是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稍加劝阻就会使人产生批斗过火的“错误印象”。因此，领导对于“群众的批斗”只会火上加油。至于领导从“群众的批斗”得出结论的艺术，恐怕连唐代酷吏来俊臣的《罗织经》也要黯然失色。

最后一步是处理，轻则降职降薪，重则被开除公职成为“人民的敌人”，或者被判刑、劳改、枪毙，因此而空出的职位，则理所当然地由这次运动的积极分子来占据。或许，不用多久，事实证明某一积极分子的检举不过是私人报复，某一积极分子的揭发不过是张冠李戴。但是，那又怎么样？运动已经结束，这位积极分子已经升了官，难道再降下来？尽管他说的不是事实，他的立场还是正确的，还是“站在党和人民一边”的。再说，运动的对象有一定比例，这位积极分子的检举揭发，至少在凑足名额、完成运动的指标这一点上立了大功。

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人民的敌人”的队伍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靠运动起家的人的队伍也逐步扩大，逐步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尽管不少这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在下一次运动中又成了运动的对象，但总的来说，这个阶层的人数逐渐增多，权力日益膨胀。不言而喻，这个阶层的共同的道德准则是卖友求荣。而这一准则自然被他们奉为“社会主义”的最高道德准则。于是，中国民间的传统道德、知识分子的气节以及共产党标榜的“实事求是”作风，都成了“反社会主义”的。至于民主与法制，自然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了。如果说，“大炼钢铁”运动剃光了无数山头，给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几十年也不能恢复，那么，这种卖友求荣的“道德准则”对群众心理的摧残，给中华民族所留下的精神上

的创伤，恐怕几百年也难以痊愈。

七、新中国的基本特征

上述几方面构成了新中国奇特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体制。中国式的种姓制度、户口管理制度和群众运动是它的三大支柱。中国式的种姓制度使得人们得以用“种姓迫害”冒充阶级斗争，掩盖了真实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户口管理制度保障一部分劳动者对另一部分劳动者的经济掠夺，从而掩藏了不劳动者对劳动者的经济掠夺；群众运动则使人民群众经常处在一种自相残杀的状态，并把一切反抗扼杀在萌芽中。正是在这一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共产党转化成为新兴的权力贵族，伟大领袖毛泽东入主中南海成了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

权力贵族和皇帝，这是1949年革命的种子在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土壤中长出一对并蒂莲。它们的生命力都来自共产党，权力贵族本身就是共产党的统治基础，而皇帝则拥有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它们有各自的社会基础，权力贵族维护着城市居民的种种特权，而皇帝则得到乡村居民的道义上的支持。然而，不论这一对并蒂莲怎样相互依偎、相互缠绕，它们却天生是对头。新兴的权力贵族要求确立稳定的贵族-平民两极社会，这意味着摆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任何个人与机构，这一要求被表述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而新登基的天子则要求建立一个正式的“皇帝-臣民”的两极社会，这意味着在新社会的机体上割去“伟大领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共产党，而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消灭三大差别”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含义。于是，新中国的城乡矛盾在当时就表现为毛泽东与共产党之间的对抗。

乍一听来，这一论点简直是“天方夜谭”。谁不知道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共产党的党史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共产党和它的领袖即使有矛盾，那也只能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这里怎么会有什么对抗

呢？不能否认，的确是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当年打江山的时候，毛泽东与共产党是等同的概念；但现在是坐江山的时候，毛泽东必须铲除共产党。即使对新中国的社会历史一无所知，只要翻一翻中国的编年史也能知道这一点。汉高祖为什么要杀功臣？因为打江山的时候需要人才，而坐江山的时候却只需要奴才。不幸的是，韩信与彭越等人为刘邦打下天下之后，仍然还是人才。刘邦不得不铲除他们。既然刘邦一定要铲除韩信与彭越，毛泽东又怎能不铲除彭德怀与刘少奇？

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怎么可以把新中国和汉王朝相比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国家政权。”是的，新中国成立时距汉王朝已两千多年，可谓久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直到1949年，中国还有90%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也就是停留在汉代；再说，毛泽东与刘邦都是借助于农民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因此，我们实在不必惊讶新中国和汉王朝之间具有某些相似的社会历史特征。江山坐稳以后，皇帝杀功臣正是这样的特征。当然，新中国与汉王朝还是有所不同，汉王朝的开国皇帝要对付的是一个个为他打天下的功臣，而新中国的开国皇帝要对付的却是一个他自己领导的，缔造的新中国的政党。如果说，刘邦不得不一个个地铲除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那么，毛泽东就得铲除共产党了！自古以来，在天子的视野里，除了三宫六院、粉黛三千，就只有宰相、群臣和百姓，哪能容得下什么党？

诚然，天子也要靠宰相和群臣来治理百姓，但宰相和群臣虽可享受荣华富贵，却不能有自己的意志，他们的职能只能是“听差”。不幸的是，共产党却远不是一群听差。它天生就是一个组织严密、纲领完整的共同体，并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成长壮大。另一方面，权力贵族并不排斥一位“伟大的领袖”，只要他维护权力贵族的权益，这样的贵族领袖相当于“立宪君主”。同样不幸的是，代表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毛泽东也远不是一位立宪君主，数亿农民要求他成为高高在上、不受任何限制的“秦始皇”。这种社会历史条件规定了毛泽东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腥风血雨的对抗，正是这一对抗奠定了新中国不断动荡的历史的基调。

如果我们抬头看看北方，事情就更加清楚了。前苏联历史上的种种令人困惑的事件，特别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大清洗”，如果不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对抗的表现，又能是什么呢？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对抗，正是苏联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同样，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对抗，则是新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

八、“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

人们根据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在它执政的新中国，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它的领袖毛泽东自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那么，怎见得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呢？不是因为它的党员出身于无产阶级，也不是因为它的支持者是无产阶级（它的党员和支持者绝大部分是农民），而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学说——马克思主义。这一结论一直被看作天经地义，但得出这个结论的整个推理却是因果倒置的。

中国共产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不决定于它所标榜的指导思想，而决定于它所处的实际地位。诚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从苏联引进的列宁-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再经过毛泽东的“创造性的发展”，与本来意义下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大相径庭，实在称不上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学说”。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成长的，在1949年以前，它仍不失为一个革命政党。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转化成为权力贵族，不是由于它的指导思想的改变而是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的改变；不是由于它缺乏先进理论或缺乏共产主义信念，而是由于“理论”和“信念”斗不过“利益”。因此，当人们根据“指导思想”来确定一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时，他们其实错误地应用了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

然而，更严重的是列宁的这个命题本身的问题。马克思在《波拿巴》一文中曾这样描写那次政变的结局：“法国逃脱整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

不必深入这句话的内容就能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把“整个阶级的专制”和“一个人的专制”区别开来。而按照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这种区别是不存在的，“整个阶级”是由某一政党来代表的，而该政党则是由一个领袖来领导的，因此整个阶级的专制就是这个领袖的专制，从而也就是“一个人”的专制；反之，一个人的专制也就是整个阶级的专制。列宁的这一命题明显地与马克思的观点相矛盾。

应用列宁的这个命题，人们可以把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区别开来，却无法理解世界历史中更具体的内容。例如，人们很难把以希特勒为元首的德国纳粹政权和以罗斯福为总统的美国代议制政权区别开来，因为希特勒和罗斯福都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在本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按照这一命题人们还可以断言，欧美各国人民几个世纪的斗争差不多一无所获，最多只不过从一种资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另一种资产阶级专政。只有1917年俄国的那个“震撼世界的十天”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了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上面只是信手拈来的几个例子。我们越是深入地考察问题的细节，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就越是显得抽象而空洞。一般地说，列宁的这一命题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倒不如说是更夫的老生常谈：“一切猫都是灰色的。”不幸的是，列宁的许多“理论”都是这种抽象而空洞的老生常谈。更不幸的是，正是这些老生常谈被人们奉为“列宁主义的核心”，奉为“试金石”、“分水岭”等等。对于这些老生常谈，我们不能苛求列宁。列宁是一个大忙人，他有太多的事情要作，实在没有时间来仔细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更没有时间来仔细研究世界历史。至于列宁的老生常谈特别受到青睐，倒也不难理解，老生常谈毕竟是人们特别是懒人最容易接受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以这些“核心”、“试金石”和“分水岭”之类为基本内容的所谓“列宁主义”，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只是一个垂死的宗派，它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科学越离越远，还总是不断地被当代的世界历史所嘲弄。

然而，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所导致的最致命的混乱，还是对

“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两个概念的混淆。若按照列宁的命题推理，一党专政只能通过该党的领袖来实现，从而就只能是一位领袖的个人独裁。这样就把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等同起来了。这种概念混淆在实践中经常出现。例如，人们曾谴责国民党的统治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同时又谴责它是“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似乎没有人感到这是两种不同的谴责。除了理论上的失误以外，特殊的历史条件也促成了这种概念混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虽然不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不幸的是，对于新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却表现为两种迥然不同的统治形式，它们之间的对立乃是理解新中国历史的关键。前者是对“权力贵族的统治”的一种不确切的表达方式，后者则是“皇帝的统治”的一种比较一般化的称呼。谁要是混淆了这两个概念，他就完全不能理解新中国的历史。

九、“引蛇出洞”？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一事件在中国产生了各种效果，其中之一是权力贵族的统治从此被称为“集体领导”，而皇帝的统治则从此被称为“个人崇拜”。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大”。由于当时中苏矛盾尚未充分展开，在苏共对中共的传统影响下，“八大”作出了“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新兴的权力贵族与新登基的皇帝的蜜月结束了，这两种力量开始了第一次较量，结果是权力贵族获得了胜利，但只是短暂的胜利。接踵而来的是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一直在号召“给党提意见”，号召“大鸣大放”，并反复承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起，毛泽东又突然翻脸，发起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运动。这一历史进程是不是像毛泽东自己说的是个“阳谋”呢？

如果把1957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里的大字报与9年后同一时期在同一大学里的大字报

作一比较，我们会得到一定的启发。1957年北京大学从5月19日开始的大字报运动在毛泽东“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时遭到镇压。1966年5月25日（又是一个多事的五月），北京大学又一次出现了大字报，不久就有工作组的进驻。工作组的部署是：“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这才是真正的“引蛇出洞”，但它并不是毛泽东的主意。毛泽东明确表态：“反对工作组镇压学生”。

另一方面，在1957年，学生们向共产党提的意见虽然相对温和，但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毛泽东当作共产党的代表。与此相反，1966年的校园英雄聂元梓、蒯大富却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于工作组来说，牛鬼蛇神是蒯大富们；而对于蒯大富们来说，牛鬼蛇神却是工作组，也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如下基本情况：1957年的学生运动既给共产党提意见，也给毛泽东提意见，毛泽东坚决反对；1966年的学生运动拥护毛泽东，反对共产党，毛泽东坚决支持。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唯一关心的是，你拥护还是反对他个人，但他并不关心你拥护还是反对共产党。一般地说，他对于自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提出的6条标准中的任何一条都并不真正关心。

那么，毛泽东1957年发起“整风运动”的初衷，是不是因为已经预见到有人会反对他自己，从而安排“引蛇出洞”呢？“反右运动”实际上是反知识分子。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已经把知识分子整得服服贴贴；在发动“整风运动”时，毛泽东没有必要对他们使出“引蛇出洞”的绝招。倒是1956年中共“八大”所通过的关于“提倡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使毛泽东如临大敌，但共产党怎么说也不是“洞里的蛇”。因此，关于毛泽东在“整风”时再三号召“鸣放”的初衷，“引蛇出洞”之说更像是事后编出来的答案。

考虑到当时皇帝、权力贵族和知识分子三方面的相互关系，对这一问题顺理成章的答案是，为“八大”的决议而龙颜大怒的“天子”想借助于知识分子和其它平民来整垮权力

贵族，以后改变方向则是由于看到时机尚未成熟。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在1957年就已经小试牛刀的计划推迟了9年才付诸实现。

十、“无产阶级专政”的下一个目标

在黑色的1957年，“大鸣大放”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即人民政府与人民的矛盾）推向前沿，权力贵族和皇帝联手，把55万“右派分子”送上了社会主义的祭坛，“反右运动”大获全胜。但是权力贵族也为这一胜利付出了代价。

像历次运动一样，反右运动的理论前提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统治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它要翦除的异己自然是“资产阶级”。而“反右运动”的对象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自然成了“资产阶级”。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在“鸣放”时响应号召给党提的意见自然都是要求“资本主义复辟”：教授治校——“资本主义复辟”，同人办报——“资本主义复辟”，内行人领导科技——“资本主义复辟”，甚至一个中学校长要求对本校教师的业务能力评定有发言权，也是要求“资本主义复辟”。所有这些要求其实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而且也都是人们在“国民党反动派”和“独夫民贼蒋介石”统治下或多或少已经争得的民主自由。但这些都与“无产阶级专政”不相容，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要求。这样一来，中国知识分子终于领教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含义：这个专政所捍卫的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原来是一个久违了的古代王国，这个王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在“反右运动”中，共产党第一次（虽然只是在私下）打出了“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政治旗帜。其潜台词是：“新中国乃是我党的私家王朝，谁敢说半个不字！”这样，人们终于明白，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也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不幸的是，经过这次付出了昂贵代价的改朝换代，人们在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中曾经挣得的少许民主自由竟然丧失殆尽。

为什么会这样呢？新中国乃是一个小农的王朝。作为新中国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已

经建立的上层建筑乃是一个新世纪的古代帝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新中国毕竟还有城市。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曾下决心在新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到了1957年，它已经基本上在新中国确立了小农王朝的上层建筑；但它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建立现代化的军事工业，从而不得不一般地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因此它仍然没有改变在城市实现“工业化”这一方针。糟糕的是，中国的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更糟糕的是，新建立的现代化的经济基础难免经常地、每日每时地长出现代化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是小农的王朝绝对不允许的。因此中国共产党除了不遗余力地清除过去的上层建筑的残余之外，还不得不在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的同时把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扼杀在萌芽状态。换言之，它不得不一方面保护原因另一方面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这就是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相应地，任何使上层建筑现代化的意向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这种用语在语义学上是不是恰当或许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坚决反对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却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未必都十分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他们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完全能意识到反对上层建筑的现代化的“无产阶级专政”乃是自身的特权地位与物质利益的保障，因此他们团结一致地反击“右派分子”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权力贵族这一“社会存在”，与皇帝之间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表面上看，“反右运动”的结局既是皇帝的胜利，也是权力贵族的胜利，实质上这一结局却更有利于皇帝，“反右运动”反的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乃是城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因此“反右运动”的胜利实质上是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对城市的现代社会关系的胜利。诚然，权力贵族在它和知识分子的对立中代表已经建成的小农王朝来对抗上层建筑现代化的要求，从而代表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但是，在它和皇帝的对立中，却是以新时代的“一党专政”来对抗传统的“个人独裁”，这时权力贵族的地位倒了过来，它自己代表城市的现代社会关系，而其对立面皇帝则代表着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既然“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维护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那么权力贵族的存在和它对新中国的统

治又怎能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呢？因此，仅仅凭借历史的惯性，权力贵族也必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下一个目标。尽管陶醉于“反右运动”胜利的权力贵族一无所知，灭顶之灾却在一步步临近。

正在此时，随着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渴望日益加强，中国有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其结果众所周知：毛泽东没有当上“国际共运的旗手”，“持续三年的大跃进”却变成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伟大领袖对于自己这一“丰功伟绩”的第一个反应是，清洗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的精英（他们还依稀记得当年革命的目的是“穷人翻身”）。不管是否自愿，权力贵族自己也参与了这一次清洗。这次清洗使得全国继续滑向“大跃进”的深渊，其后果是饿死了三千万中国人。

空前的灾难导致民怨沸腾，权力贵族与皇帝同样失去民心，但首当其冲的还是皇帝。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形势竟然迫使“一贯正确”的“天子”作了自我批评，权力贵族对皇帝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不幸的是，这次短暂的胜利却使得毛泽东与共产党（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之间的对抗公开化了。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实现铲除中国共产党的宿愿。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历史形成的，铲除它得有一个过程。在苏联，斯大林借助于宫廷政变，借助于秘密警察，通过“肃反”、清洗和暗杀，逐步铲除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当上了“新沙皇”。新中国则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这一历史转折，根据中国的特点，毛泽东再次诉诸群众运动，于是“伟大领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红卫兵运动”“扫四旧”，“斗牛鬼蛇神”，似乎漫无目标。只有当运动发展到“踢开党委闹革命”和“军队支左”时，才显出其自身的本来面目：这是乡村起来反抗城市，这是武装力量起来压倒组织力量，这是皇帝起来铲除权力贵族。

运动造成了普遍的毁灭：生命和财产，文化和科技，道德和人伦。■

【序跋】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

李锐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的宪法和党章还将这个主义列为我国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也是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理论依据。可以说，不弄清马克思主义，也解决不了我们过去为什么走到十年“文革”国将崩溃的道路，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20世纪给世界带来最大影响和变化的，不单是两次世界大战，更重要的是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与较量，尤其二次大战后，史学界称为冷战时期。中国在20世纪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苏联掌握共产国际这个组织，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政府叫“苏维埃政府”，作战的军队也叫红军。延安整风时，我们学习的主要教材就是斯大林著的《联共党史》以及“布尔塞维克化12条”。列宁、斯大林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即领袖专政，成为中共革命和建国的母本。毛泽东经过整风运动确立了自己独断专行的体制之后，经过1949年的革命胜利，向苏联“一边倒”，照搬并发展苏联模式，消灭一切私有制，实行国有化计划经济后，异想天开，超英赶美，三面红旗“大跃进”，争取先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从而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就为生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扬言“我从马克思只取来四个字：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认为“东风已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了”。1976年，毛泽东不去世，十年“文革”的案还翻不过来。

1989年初，应美国哈佛大学邀请，作为访问学者我在美国六所著名大学活动了40天，听到美国一些学者谈到，苏联最迟到2017年一定会崩溃，他们是从经济方面的研究作出这个判断的，当时我还不相信。真没料到很快就“苏东波”，社会主义阵营垮台了。久加诺

夫总结教训承认，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思想垄断为红旗落地的根本原因。

《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是以所谓“剩余价值”学说揭示当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以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通过暴力革命，建成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三大体制为特征的专制社会主义（他们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20 世纪的历史发展，两大阵营的变化，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还是要依靠科学知识的创造，自由民主的社会，走市场经济和宪政治国（靠法治不是人治）的道路，而不是靠什么主义，一党专政，哪个“核心”说了算，所能办到的。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为追求早日实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制造一系列政治运动，“大跃进”失败后，又继续十年“文革”，不惜同普世规律背道而驰。可是我们虽然有所觉悟，搞了经济改革，但仍坚持政治垄断“一党专政”和思想垄断（控制舆论），以致腐败丛生，危机四伏，共产党变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见不到多少社会主义的东西，反而出现胡耀邦辞职、“六四”大风波、赵紫阳被长年软禁去世的局面。

现在有许多人，包括老中青三代，尤其专家学者，都在反思中国的问题，已经出版许多有关著作。张宣三老同志老专家，已 93 岁，以自己的学识功底，专业经验，党内生活阅历，系统地研究了马恩列斯毛的理论与实践，揭示出我国至今仍未能实现国家现代化，以宪政治国的原因。我同张老相识很晚（他比我大一岁），拜读过他的好多文章，现在这本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文集，即将出版，我愿意做序，也是由于多年来关心的就是“何时宪政大开张”。

衷心希望党内党外、上上下下、老中青三代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们，向张老学习，都来关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按：张宣三，1916 年出生。笔名余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评论】

黎澍的发现

——马恩没有说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启之



李洪林谈到马克思主义时，提到所谓“历史唯物论”。有四个问题是值得重新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关系。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实际上历史怎么发展？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怎么会有文化大革命？……所以，人民群众‘应该是历史的主人’，但是不是就能够把历史创造出来？这个事情是值得研究。”

这个事情，黎澍先生在1984年就有了结论，他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中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类的话，这话是苏联哲学家尤金从联共布党史中引申和附会出来的。

黎澍说：“如果说，全部历史，千秋功罪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都决定于人民，那么，这就等于说，历史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社会分工，也不存在阶级的区分，统治者不存在功罪问题，这完全不合事实。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人民群众是被统治者，是奴隶，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现在尊他们为全部历史的创造者，既使他们承受了非份的光荣，也使他们承受了不应有的罪责。”

事情很清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说法，是反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干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封建主义之实的勾当。

李锐给《黎澍集外集》写过一篇序，序里说，“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凡是

愿意思考、有历史责任感的，都不免要回过头来，对自己原先相信甚至坚信不疑的东西进行一番审视。”还说，黎澍的反思与众不同，“他的思想锋芒所指，不仅仅是某个具体问题或某条理论公式，而是触及指导、规范我们所有人的思想、行为的根本理论原则和规章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据我看，这本集子，说的尽管是一部电影，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同样是我们长期习焉不察的根本理论原则和规章制度。

我所说的“根本理论原则”在这里指的是如何看待人民群众。我们一直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于是，“人民”或“人民群众”就被套上了耀眼的光环，成了高于一切的道德准则。从建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很多蠢事、坏事都是在“为人民”、“为工农兵”、“为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名义下干的。这种道德准则贯彻到文艺中，就出现了如何塑造英雄的理论和创作，结果人民群众/工农兵被写成了完美无瑕的英雄，直至成了样板戏中的“高大全”。甚至连孩子们也都成了小英雄，个个像海娃、小兵张嘎、潘冬子一样。

姜文的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他写了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的愚昧、麻木和奴性，就被强令修改。修改的理论根据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假马克思主义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文艺教条。不修改，就禁映，而且剥夺人们的发言权，评论权。这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封建主义之实，又是什么呢？

按照这种文艺教条，有关部门最应该惩办的是鲁迅。众所周知，鲁迅是最早也是最深刻地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的，用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标准来衡量鲁迅的作品，同样也可以得出“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的结论。鲁迅之所以称赞萧红，是因为她在《生死场》里真实地描写了沦陷区乡民们的愚昧、麻木、奴性的精神状态。按照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标准，她的作品同样“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在批判国民性上，姜文不过是个“小巫”，是个晚生后辈。他的勇气本应该得到称赞，他的作品本应该得到表彰，结果呢，却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一方面提倡向鲁迅学习，另一方面却向学习者兴师问罪。这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我们电

影审查的思想标准是混乱的。

鲁迅成名于二十年代，萧红成名于三十年代。他们能够成名，靠的是发表文章，出版作品。这说明他们当时的环境无论多么糟粕，当局还是允许自由言说，至少允许批判国民性的言论存在。时间过去了七八十年，一部同类的作品却通不过。这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我们电影审查所依据的理论原则和文艺标准是倒退的，它非但没有“与时俱进”，而且远远地落后于二三十年代。

鲁迅不会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荒谬说法。而整天鼓吹这一说法，把人民群众举得高高的人，往往与爱国爱民无缘。“四人帮”整天喊着为人民服务，而祸国殃民，莫之为甚。反之，批判国民性的，倒多是爱国爱民者。鲁迅以批判国民性终其一生，他的死的时候，身上却覆盖着“民族魂”的大旗。

封建主义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双百”方针是毛泽东 1956 年提出来的，可很难说真正贯彻执行过。为什么呢？黎澎讲得很清楚：“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这个规定有普遍意义，并且首先指对政治问题的发言权，它是公民的政治权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非是人们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享有充分言论自由的形象化的提法。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需要有不受限制的思想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适应艺术和科学的这个特点提出来的。但是这种自由必须以宪法规定的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言论自由获有充分保证为前提。毛泽东同志在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显然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争取学术问题得以进行自由讨论，实际上就是承认可以不要政治上的言论自由，只要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事实证明，如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健全，人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保障。林彪、四人帮用他们的所谓全面专政把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全部剥夺干净，可以算是个严厉的教训。”

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认真地接受这个教训，“双百”提出快半个世纪了，“文革”结束快三十年了，可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还在发生着巨大的作用。这本书就是一个例子——我相信，如果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思想解放一点，就会重新评价《鬼子来了》这部影片，

如果允许电影界讨论审查委员会的意见，这部影片就不会被禁。如果我们真正跟国际接轨，就会借鉴一下西方的电影管理办法，而不会闹出外国得奖，中国禁映的笑话。

2002年10月，我在给江泽民同志的一封信中说，“言论自由特别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能及时有效的监督政府权力的滥用，必须得到充分的保证。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贯彻双百方针，活跃自由讨论，以此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而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舆论，成为新闻出版监控部，这也不准说那也不准讲，甚至动辙‘查封’，‘上名单’，这些错误作法，起着破坏宪法和损害党的信誉的作用。”两年多过去了，情况并没有丝毫改变。一个“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社会，算得上“和谐”吗？

在这封信里，我还说：“要真正保持稳定，要‘与时俱进’、‘全球接轨’，要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持续发展，关键还在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显而易见，这部电影的遭遇，清楚地表明电影审查制度的不合时宜，作为旧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它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

【文摘】

王若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¹

从追求到幻灭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一段讲中国人如何寻找革命真理的话。他说，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象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经历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可是都行不通。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

¹ 此文原载《北京之春》1996年1月号。

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革命才面貌一新，取得胜利。于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时间过了四十多年，这个描写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命运的话，现在可以移用来描写马列主义了。在建国以后，多次运动，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翻天覆地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因此很自然，“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我可以借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描写现在一些包括我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恩格斯说到十八世纪法国的那些伟大的启蒙学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自认为代表永恒真理和普遍正义，他们要求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法国革命胜利了，结果如何呢？新的制度诚然比旧制度合理，可是仍然弊病丛生，充满罪恶。所谓“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不过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我读到这一段话很有感概。共产党也曾用豪言壮语向人民做过一次又一次的许诺，指点着那宏伟美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图景，后来呢？谁都看到共产党的宣传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毛泽东逝世，国门打开了，中国人惊讶地看到了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资本主义体系竟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和千疮百孔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自己走过的路。经过改革开放，我们重新找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经济的道路。这期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了。于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二十世纪确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勃兴和失败的世纪。在本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到这个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的红旗落地。我们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现在难道不应当用实践来检验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吗？另一方面，我们的实践是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也是一个问题吗？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

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机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苏联学来的，是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担任过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工作的逢先知说过：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最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工夫最大的也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自己也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少年来，我们跟着苏联人说“马列主义”，好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同一个东西，谁违背了列宁主义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从未想过，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尽管它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过去习惯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一样。实践的结论果真如此吗？

其实，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证明了一件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点只是证明了列宁的思想。但是武装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列宁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

在二十世纪初，俄国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根据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引用的1897年的调查材料，当时经营农业的人口约占全人口的六分之五，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列宁承认这一点，他在《两个策略》中批评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呓。“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

“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列宁选集》1卷541页）

当然，列宁认为这样的革命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并在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同上548页）。“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同上547页）。

可是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后几个月，列宁就发动起义，来了一个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那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远没有完成，而且并没有“经过革命发展中的许多中间阶段”，更谈不上“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就马上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提出过要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列宁并没有提到这个过渡的经济条件，而这本来是最重要的。第二国际和俄国有一些理论家反对在俄国搞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俄国没有这种客观的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在1923年初写的《论我国革命》中反驳了这种观点。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抛开那些对论敌表示愤怒和讽刺的词句，其实真正的论据是很薄弱的。

列宁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选集》第4卷691页）“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同上692页）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水平，这是社会主义的前提。现在列宁说，达到这个水平也需要前提，我们可以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这种前提，这就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然后走向社会主义。

但驱逐资本家，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这已经是在搞社会主义革命了。对方的意思是说，搞社会主义革命，需要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或社会文明的前提；而列宁把对

方的逻辑颠倒过来，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生产力和社会文明达到社会主义水平的前提。这样一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不以经济和文明水平为前提的东西。

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就这样草率对付过去了。三十年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重述了列宁的观点。斯大林承认，在十月革命后，“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斯大林选集》下卷，542-543页）同一个斯大林在不久前还说“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同上502页），现在变成上层建筑创造基础了。

这怎么可能呢？斯大林说，这是因为苏维埃政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同上543页）苏维埃政权把生产资料公有化，就解决了这个矛盾。

斯大林说俄国工业中的生产力具有社会性，其实一切近代工业都是这样。但是在工业发展初期，其社会性也是很低的，所以它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并不显著；只有到工业高度发展后，这个矛盾才突出起来。要搞社会主义革命，需要这个矛盾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但当时的俄国离这个阶段还很远，它还处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怎么可以以此为理由搞社会主义革命呢？斯大林用“特别是”这个词来强调社会性存在于工业中，以便使读者忽视在工业以外的农业，而俄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从整体说，俄国的生产力并不具有社会性。照斯大林的逻辑，等于说，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是适合于俄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

这是违反规律的。斯大林的辩护完全站不住。不如说，俄国革命是依靠了布尔什维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条规律，那就是：生产力一定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布尔什维克做到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他们无法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农业，许多年内还达不到沙俄时期的水平。如果一种生产关系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那么凭什么说它是先

进的呢？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理论，把中国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他说过：“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选》3卷1060页）；“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产阶级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毛选》4卷1431页）。他还预言那时“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毛选》2卷650页）。到一九五三年，毛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还说，过渡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可是三年后，他就忘掉了自己说过的话，匆匆忙忙搞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六年，中共在八大决议中，说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等于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适合中国的经济水平的。

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反。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列宁批评第二国际执行机会主义路线，其实他自己就在搞机会主义。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

建国以后，我们本应当批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但毛泽东却要批判所谓修正主义。“修正主义” (revisionism) 这个词，本应当译为“修订主义”。修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了。现在不管对错，一律斥为“修正”。由于我们多年批判“修正主义”，“修正”这个词也变成了“以错误代替正确”的贬义，这和这个词的本义正相反，并且造成一种印象，好象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修正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应当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修正的，问题只在修正得对不对；或者说，是不是真正的修“正”。斯大林和毛泽东有一个教条，说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

别结论是可以修正的，基本原理则不能。他们批判“修正主义”，就是因为修正主义者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如果错了也要修正；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修正的观点，是教条主义。根据波普尔的观点，任何科学理论都无权认为自己是永远不会推翻的；我同意这个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即代表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和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要打倒资产阶级，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这里，马克思是把资产阶级当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势力来看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就认为，资本主义的寿命不长了。晚年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纠正了过去的过分乐观的看法，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工人阶级的战略应当是由革命转入和平发展，应当很好地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如争取普选权，参加国会等。

二十世纪初，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重新论证资本主义到了最后阶段。然而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历史证明：帝国主义阶段过去了；资本主义发展着。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很多变化，它仍然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些变化，马克思预见不到，列宁也预见不到。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应当说，从马克思逝世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总的来说是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级。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恩选集》2卷83页），但当初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过早地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的毛病，不是中国党独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根子在老祖宗那里就产生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处在发展初期，他们是资本家又是经营者、管理者；对于发展工业和商业，他们比共产党有经验。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庆祝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实际上，这是把一大批有经营管理经验和能力的人抛弃了，不是有利于生

产，而是相反。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从海外和境外“引进资产阶级的人才和经验”。刘少奇在50年代公私合营前提出“剥削有功”是对的。让他们进行一些剥削，换取他们努力增加国家和社会的财富，这是得大于失的事情。八十年代我写过一篇《重提猫论》，其中说，我们长期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猫与鼠的关系，其实是不对的。真正的老鼠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贫穷”与“落后”。资本主义是一只猫，它可以帮助我们消灭这两只老鼠。资本主义有利也有害，但是它的祸害比较起贫穷与落后来是较小的。

中共曾经吹嘘过在大陆消灭了剥削，实际上从来没有过。我们应该反对超经济的剥削，反对过分的、残酷的剥削，但是完全消灭剥削是做不到的，也没有必要。资本家个人的消费总是有限的，大量的利润还是要用来扩大再生产，既给社会增加了财富，给国家增加了税收，也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可怕的是“官僚所有制”。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来由于官僚主义的决策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任何资产阶级的剥削也不能比的。

我想提一个尖锐的问题：拿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比较，到底哪一个阶级是进步的，哪一个阶级是落后的呢？

几十年来，我们从政治学习中受到的教育，都是告诉我们，农民阶级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后来变成反动的，是专政的对象(这就是《5.16通知》的思想)。

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衡量一个阶级的进步与否，要看它的经济地位，要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资产阶级是同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它和无产阶级、科学技术人员一起，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力，因此它是进步的阶级；至少在它变得阻碍生产力发展之前，我们不能说它是反动的阶级。上面我已谈到经营管理的作用，现代的资本家许多已变成了股东，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了，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反对普通人在银行存款获得利息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反对从投资中获得利润，只要这对社会的生产发展有好处。这是从总的历史过程来说的，它并不排斥在某个时期，某个国家，资产阶级可以在政治上可以采取反动的立场。

《共产党宣言》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但是过早地认为，这种积极作用已经完了。对于农民，《宣言》却认为，这个阶级是和小生产联系的，因而是没落的和保守的阶级；他们只有离开原有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才能变成革命的。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联合农民的思想。这是为了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不表明他们认为农民是一个先进的阶级。

列宁和毛泽东都很重视农民。同农民联盟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关键，因为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渴望改变自己的贫困地位，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农民究竟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即使取得胜利，最后还是回到封建主义，起义领袖背叛了原来的阶级，当上了新的皇帝。

那么知识分子呢？毛泽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就是让农民改造他们。

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确实受过“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这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但这是进步的思想，比毛泽东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要进步得多，也比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思想进步得多。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但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加以贬低，作为“臭老九”加以歧视，是荒唐的。

共产主义——科学还是空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过去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只有他们才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非常好的，可是怎么实现呢？如果你去读一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就会发现，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甚至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的。马克思描绘说，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

工人“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可是这种制度并不诱人。就我来说,还是宁愿带着钱包,到市场上去自由选择。不但如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到了这一条;而且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现在所有自称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都是不够格的。怎么办?要这些国家不用“社会主义”的名称,也不好办。于是有些学者区别了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为什么要消灭商品与货币呢?因为他要彻底消灭剥削。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大于他所得到的工资,因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和他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相等。这种情况,使得剥削成为可能。只要有商品和货币,价值与价格的背离就是不可免的。要彻底消灭剥削,严格实行按劳分配,就要废除货币,直接按照工人的劳动来计算他所创造的价值来付予报酬,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证券。同样,一切产品也不能有价格,而是标明其中含有多少劳动量。工人就用他的劳动证券,去领到具有同等劳动量的产品。这样也就消灭了商品。

马克思的这个设想,建立在他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劳动创造价值,一个产品的价值,就以制造这个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比如造一张桌子,甲要三天时间,乙要两天时间,丙要一天时间,那么制造这张桌子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两天,这就是它的价值。这个理论,是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应用到简单劳动上,好象没有什么问题;应用到复杂劳动上,就有些困难;应用到单纯的脑力劳动上,特别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上,就完全不行了。体力劳动的产品,是可以规格化的。甲乙丙三个工人造出的桌子,必须是一样的,这样才好比较,才好用数字来计算。但是脑力劳动的产品怎样比较?怎样计算?鲁迅写《阿Q正传》,该给多少报酬才是不多不少?如果有另外的张三和李四,也写出了《阿Q正传》,一模一样,那就好办,可以把三个人所化的写作时间平均一下。但《阿Q正传》是独一无二的,别人写不出来,那么就没有什么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不仅如

此，仅仅按一部文学作品的写作时间来给予报酬，也是不公道的。写作一小时总比造桌子一小时的劳动复杂得多。那么怎么计算？按计算复杂劳动的办法也不行，因为这里有天才，有灵感，这是根本不可能计量的。按照一部文艺作品的创作时间来衡量其价值，这是可笑的。

还有，在这个信息时代，信息是最宝贵的财富，但如何计算信息的价值？用劳动时间也是不行的。

战后的科学技术革命表明，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社会财富的贡献，他们所创造价值，比工人农民多得多(尽管他们离不开工人农民)。在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对脑力劳动的蔑视以及“工人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除了科技的作用以外，企业管理的作用难道可以忽视吗？同样一个企业，由某个厂长来经营就亏损，换一个厂长来就扭亏为赢。应当承认，经营管理也是创造价值的；不过这种劳动也是脑力劳动，同样无法按时间来计量其价值。

所以，在现代的条件下，单靠工人来创造价值是不行的，还要靠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还要靠经营者和管理者，即现代的经理阶层。工人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工作者也是生产力，经营管理者也是生产力：财富是由这三部分人联合创造的。虽然我们无法计算这两部分人的贡献，但是可以肯定一个科学家或一个总经理的贡献要比一个工人大得多。

这样，“剥削”的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了。从总的方面来说，现代社会财富的巨额增长，工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不是由于工人和农民加重了劳动强度，而是受益于科学技术；科学家所得到的报酬，一般的是低于他们的贡献的。难道不可说，脑力劳动者所给予体力劳动者的，要大于他们得之于后者的吗？

我们不可能要求严格的按劳分配(尽管这已载入宪法和党章)，但是我们应该要求相对合理的分配。在今天的中国，这种相对合理的分配也没有做到。

马克思为什么要废除私有财产？这是基于两个理由：一、为了消灭剥削；二、为了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马克思认为，残酷的剥削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

停滞，废除私有财产将解决这两个问题，从而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我们已看到严格的按劳分配的不可能，那么全面的计划经济可能吗？资本主义经济是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人们能不能用自己的手来完全代替那只看不见的手呢？事实表明这是不可能的。现代市场经济瞬息万变，复杂万千，就是有一个万能的超级计算机，也不可能把全部变数纳入人为的计划之中。这一点，苏联和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我们至多只能做到在市场的自发经济基础上加上人为的计划调节，但不可能不要那只看不见的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海耶克批评马克思过于迷信理性的力量，错误地以为社会制度的变革是可以用理性来设计的；我以为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

既然完全消灭剥削和彻底实行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废除私有财产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了。不要说在本世纪初的俄国没有条件实行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社会主义，就是在今天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生产力水平很高的美国，如果要没收私有财产，取消货币，那么美国的经济马上就会崩溃。

马克思对这种危险，并不是没有一点预计，所以在《共产党宣言》里，尽管在原则上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但它的十条纲领并不是那么激进的，只提出剥夺地产，高额累进税，没收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国家垄断经营银行、运输业等；至于消灭阶级差别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马克思只是含糊地说那是要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事。

有趣的是，今天我们来看《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会发现，在有些方面，如高额累进税，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城乡对立的消灭以及义务教育，西方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做得更好。

时代变了，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转到资本主义，或者采取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两种制度正在靠近。

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要解放全人类，但他们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又误以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在私有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下去，社会将迅速两极分化，好象一

个葫芦形，中间最细，两个头，一大一小，一头是人数很少的大资产阶级，另一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斗争将决定人类的未来。历史的发展否定了马克思的预言。拿现在美国的例子来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整个社会象一个橄榄形，两头小，中间大；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至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象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贫困化，而是大大改善了。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在六十年代的《资本论》中描绘的英国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看不到了。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工人不接受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

工人阶级队伍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工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在车间劳动的“蓝领工人”。现在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了。

从战后这些年的历史看，资本主义世界中推动历史进步的并不仅是工人运动，还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黑人等少数民族运动。工人阶级也不一定走在社会的前列，更谈不上领导社会的潮流。现在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共产党的势力都在衰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是没有的。大学里倒有不少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但那并不是同工人运动结合的。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即通过解放全人类而解放自己。《国际歌》批评了“救世主”的观点，但这种把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赋予一个特定的阶级的观点，何尝不是承认有一个“救世阶级”？

从无产阶级专政到领袖专政

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赋有历史特殊任务的观点，为列宁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他的共产党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既然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那么它当然要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怎样来实现它的领导呢？通过共产党。这是列宁的观点。

在中国，过去把一切邪恶的品质都归于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被说成是大公无私，最

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似乎就是一切美德的化身。这样的无产阶级只存在于头脑里，在现实中从来不曾存在过。现实情况是，工人身上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品质缺点，于是就把这些归咎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资本主义的腐蚀。

在理论上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但在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似乎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无论政治上还是社会地位上。他们应该有的特殊地位，被代表他们的党占有了。

这样，共产党就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成了改造者、解放者、教育者，其他的人们都是被改造者、被解放者、被教育者。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有了合法性。社会主义国家成了西方学者所谓的党治国家或“党国”(party-state)。我们中国叫做“党天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喜欢国家(此处的“国家”指国家机器,或马克思说的“政治国家”)。他们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暂时的过渡。国家要消亡,国家的某些职能将转交给社会来承担。他们心目中的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并不是国家所有制。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组织。后来马克思没有重复这个观点,而恩格斯提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列宁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不是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这又被说成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列宁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而党又是由少数领袖来代表的,这样共产党专政又变成领袖专政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要属于列宁。

马克思和列宁都抨击了资产阶级民主,在当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在当时确实不完备。列宁的抨击尤其严厉,他声称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形式的、残缺不全的,而无产阶级民主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好万倍。这个比资产阶级民主好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百年来,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进步,过去没有选举权的妇女、穷人、少数民族,现在都有平等的选举权了;人民也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结社、游行等自由权了。相形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来表达民意,

监督和控制党和领袖，防止滥用权力，其结果是党和领袖凌驾在人民和无产阶级之上，异化了。

当年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抨击，如“虚伪的”“形式的”“残缺不全的”，移来描绘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倒是很合适的了。现在官方已经不再重复列宁的论点，而是说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情况。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列宁回答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为领袖的人们来主持的（《列宁选集》4卷197页）。

列宁批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群众和阶级，政党和领袖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对的；但列宁却陷入了另一个极端。照这个说法，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群众，所以群众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专政；因为党是由领袖领导的，所以最后是归结为领袖专政。

斯大林看到了这种理论的容易受到批评，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企图加以弥补，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作用（党“专政”）之间不能划等号。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党专政，但不是说“完全”是。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前提是“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党和阶级间有着正确的相互关系”（《斯大林选集》上，423页）。“如果党的政策不正确，如果党的政策和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可以不可以认为党是阶级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同上425页）。

斯大林看到了这种危险，可是后来他自己忘掉了。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似乎一个党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它就代表无产阶级，用不着征求一下广大工人的同意；一个党曾经代表过人民，那么它就永远代表人民，不需要人民来审查是否合格。任何地方、任何部门的工作出了问题，有了缺点，需要纠正和改进，第一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几十年中，不断加强党的领导，随之是领袖地位的加强。党是全能的，党的全能又归结为领袖的全能。

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也想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就批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九评”的第二评即《关于斯大林问题》中说：“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在这里，正是利用列宁观点中的弱点来为个人崇拜辩护。

列宁观点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忽视了这一点：党是可能从本阶级异化的，领袖也是可能从群众异化的；异化了的党不能代表无产阶级，异化了的领袖也不能代表群众。

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无法防止党和领袖的异化。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没有看到，最主要的危险是党和领袖的异化。后来，为了要搞“文革”，他提出党内出现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其实，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他脱离了人民，君临于群众和党之上，谁也不能制约他了。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批判“救世主”思想的，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实际上代替了救世主的地位，成为救世阶级。到了列宁，这个救世阶级又为共产党所代表，成为救世党；党又掌握在领袖手中，于是领袖实际上成为新的救世主。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已陷入困境。列宁胜利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又提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使得马克思主义走到东方来了，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列宁主义从此成为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旗帜，十月革命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的道路。但俄国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并未经过批判的审查。列宁组织“第三国际”，就急于推广俄国的经验，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被误解的马克思

现在再来看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是一个马克思遭到严重误解的领域。为什么会误

解呢？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研究工作已经做了几十年，为什么还有误解呢？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较少受到误解的，因为马克思有三卷《资本论》摆在那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有误解了，因为马克思讲得少。哲学呢？我们过去受苏联影响，只读恩格斯和列宁的几本书，很少读马克思原著。马克思早年钻研哲学，写过一些文章，但都不好懂，后来他把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学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些重要遗著只是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才发表，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列宁都没有读过。不能说列宁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了解是深刻的，斯大林就更不消说了。斯大林有条件读到上述的马克思著作，但他根本不重视，也不知读过没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又是受苏联影响的。我们长期跟在苏联后面，把列宁主义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合法的继承和发展。这个影响时间是很长的。

为了说明列宁的哲学思想同马克思的不同，让我们先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起。

《唯批》的基本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个命题好象没有错，难道马克思不是也这样说吗？问题就出在对“反映”的了解。列宁是把这个词和“摄影”、“复写”的同义词来使用的；他在书中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声明“反映”和“摄影”、“复写”有什么不同。这种认识论，是常识的唯物论。在中国，由于多年来照抄苏联的说法，学校和课本中都是这样讲的，所以许多人也就以为这就是马克思的哲学。

列宁反复强调，认识的对象，即客体的存在，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这种话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对的，但不能成为一个普遍的命题。我面前的这种桌子，当然是独立于我的意识而存在的；但是桌子不是自然物，它是人造出来的。造第一张桌子的人，总要事先有一个设想，也就是桌子的观念。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的特点，就在于他在制造一件产品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的结果在一开始“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恩全集》23卷202页）。不仅桌子，

所有的社会财富都要这样看。自然是财富的母亲，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初把财富看做是单纯的客体，看成是独立于人以外的、不依赖于人的自然物，亚当斯密则把财富看做是劳动的创造，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桌子看成是客体，还要看到桌子的主体方面，也就是从桌子中看到人的劳动、人的意志、人的智慧。这就是见物又见人，并且是从物中见人。不仅如此，桌子是商品，它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什么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的关系。离开了人，离开了社会，就没有什么价值。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按照列宁的观点，客体就是客体，不依赖于人存在，这正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马克思在著名的《费尔巴哈论纲》中说以往的唯物主义对现实只是从客体方面来了解，没有从主体方面来了解，就是这个意思。

上面说的是对马克思的第一个误解；现在来说第二个误解。

马克思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列宁按照他的反映论观点对此作了解释。他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列宁全集》18卷338页）

那么马克思说的“存在决定意识”就是说意识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吗？错了！

马克思说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它并不是在人以外的东西。马克思说的“社会意识”，包括宗教、道德、文艺、法律、哲学等意识形态，它们不是反映人以外的东西，而是反映人自身的存在，而且这种反映也不是依样画葫芦的复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是在贬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的，是说这是一些打上了阶级烙印的虚幻的观念。拿宗教来说吧，它不但不是什么客观存在物的“近似正确的复写”，甚至根本不是复写。那么怎样用社会存在来解释它的来源呢？

人创造了上帝，但人却反过来说上帝创造了人，这是一种异化，一种颠倒。马克思说：

“国家、社会创造了宗教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马恩选集》1卷1页）“宗教里的苦难就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或者说，它是“人民幻想的幸福”（同上2页）。

因为人民遭受苦难，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要创造出上帝来，作为祈求的对象，把幻想寄托于死后的天国。这样，宗教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但它是一种曲折的、歪曲的反映，不是那种照镜子式的反映，不是列宁理解的那种反映。

列宁在《唯批》后写的《哲学笔记》中，局部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说人的心灵认识事物，“不是简单地、直接地、照镜子那样死板的行为，而是复杂地、二重化地、曲折地...”。照镜子和照相是一回事，说认识不是照镜子，就是说不是照相。

其实，意识形态已经不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了（并非一切思想都是认识）。拿客观的桌子产生桌子的观念这种“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意识形态的产生，是根本不行的。前者是用人以外的客观对象来说明感觉和表象的来源，而后者是用人自身的社会存在来解释意识形态的根源。在前者的情况，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是来自面前的客观对象。在后者的情况，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思想是受什么东西在背后推动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马恩选集》4卷250页）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只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历史唯物主义”的“物”，就是哲学上讨论的“心物关系”或“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的“物”吗？否。马克思指的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产、生产方式、社会存在，但所有这些都是离不开人的。它是指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人的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人的社会存在；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不是纯粹的物质，人有肉体和精神，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简单地把一般唯物主义原理搬到社会历史中而得出来的。

官方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阶级性，这样就一方面取消了人的共性(人性)，另一方面抹杀了人的个性。他们的根据，就是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普遍误解。

第一，社会关系是很丰富的，两性关系、亲子关系和朋友关系等都是社会关系，不能全部归结为阶级关系。阶级关系诚然很重要，但是把这种关系从人的总体抽出来，抛掉其他关系，这仍然是抽象的人。马克思说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仅仅是阶级关系。

第二，社会关系是会异化的。许多人都忽视了，马克思在上面那句话之后，紧接着说：“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批判人的本质呢？

马克思在另外的地方说到“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哲学手稿》），又说，劳动是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而劳动是自由的实现。我们有足够的根据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人的本质是自由。但这个本质不是现成地给予人的；换句话说，人不是生而自由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既区别于卢梭，又区别于萨特。人能够自由，这只是人的潜能，要通过劳动来实现它，而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而生产方式是前一代人留下来的，不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自由。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的、从动物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反杜林论》）

但是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人在获得自由的过程中又会陷入新的不自由。例如，一定的社会关系本来是使得人的自由能够实现的条件，却又可能变成人的新的桎梏，这就是社会关系的异化。

现在我们可以较好地理解马克思的话了。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人的本质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关系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是社会关系是会异化的，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不但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反而成为反人性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批判这种“现实

的本质”，所以没有革命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不仅要批判，而且要推翻：“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马恩选集》1卷9页）。

从这个观点来看，阶级性虽然可以说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这是异化了的本质，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被摧残为畸形的人，变成了奴隶，变成了活的机器，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雷锋以当齿轮和螺丝钉而自豪，马克思则尖锐地把这当做资本主义对人的扭曲来批判），这是人性的异化。

马克思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无产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对他的生活状况的愤慨，就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马恩全集》2卷44页）马克思曾赞扬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但是他从没有象后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把工人阶级描写得完美无缺。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消灭自己，消灭自己的阶级性，恢复自己的人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实践的唯人主义

几十年中，某些流行的哲学教科书翻来复去讲的是“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这种讲法，没有跳出旧唯物论的窠臼。人们以为，只要加上“思维对存在起反作用”就足以和旧唯物论划清界限了，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一九三二年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手稿》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件大事，欧洲一些“马克思学”的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他们发现了一个不同于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一时轰动了欧洲。虽然这项研究为二次大战所中断，但战后又以其冲击波震动了北美，出现了一大批有关著作，并且孕育出了不同的学派。可以说，《手稿》赋予马克思主义第三次生命。

中国翻译《哲学手稿》不算太晚，一九五六年第一个译本就产生了。然而由于原文的

艰深和译文的晦涩，当时只有少数人注意；到八十年代初才在学术界形成研究的热潮——然而这时青年人已开始厌倦马克思主义了，他们追求更时髦的东西，从尼采到萨特。另一方面，官方又把这种“异端”马克思主义视为主要敌人和批判对象。到现在，青年学生仍以为马克思主义只此一家，无非是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别的呢？

然而如果不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联系起来，就不可能对马克思有完整准确的了解，就看不到马克思思想中最宝贵的东西。

马克思的出发点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是现实的人或实践的人。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历史哲学，它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恩全集》42卷131页）。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人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着人的世界，同时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着自己。

最初的人和动物的区别不是很大的。人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就是解决衣、食、住的问题，因此就要进行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点的重要性予以充分估计，说这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恩选集》1卷32页）。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其他都谈不上。

但仅仅是停留在维持生存这个水平上，人和动物就没有多大区别了。“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然而，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它们成为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样的抽象中，它们就具有动物的性质。”（《哲学手稿》）

对马克思主义的第四种流行的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最关心的是人们的吃饭穿衣这种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就是人人有饭吃，有衣穿，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就是人人都过富裕的生活；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吃饭哲学”。

E. 弗洛姆早在一九六一年发表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就有力地批驳了这种观点。他感到奇怪的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这样批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也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批评过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公式用来解释历史（见《马恩全集》32卷671-672

页)。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发展。因此，阶级斗争不仅是争取生存资料，而且是争取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见《马恩选集》3卷572页)。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享受；我们在许多年内把享受当做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这是违反马克思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只反对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别人的痛苦的背上，要改变工人只劳动无享受和资本家只享受不劳动的状况。享受有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或文化享受)之分，物质享受是消极的，精神享受高于物质享受。享受不是最高的需要，最高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也就是发展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这要通过自由劳动来实现。所谓自由的劳动，并不仅仅是不受剥削而已，而是一种创造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人性的需要，同时也是享受，是“乐生的要素”。马克思认为，即使消灭了剥削，只要劳动是为了衣食，为了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这种劳动就仍然不是自由的，是不得不进行的，它仍然属于“必然性的王国”，真正的自由王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恩全集》25卷926-927页)。恩格斯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人类就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但是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领域是人类不能完全摆脱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自由王国才能繁荣起来。

这里的关键在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经济学上有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开支与家庭总消费支出之比，其数值越小越表明生活富裕。按照马克思，必要劳动时间越少，自由时间越多，越表明生活的自由和丰富。所谓自由时间，主要不是指闲暇时间，而是指进行创造性劳动(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建筑设计、理论构思、文艺创作、艺术表演等等)的时间。

马克思曾从人的发展角度把社会形态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形态(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特点是人的依赖性；第二大形态(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人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第三大形态的特点是自由个性，这种自由个性是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财富的基础上的(见《马恩全集》46卷，下，104页)。

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人，为了创造这种人，就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条件，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地全面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实现自我的同

时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样的社会不要求个人牺牲自己，相反，“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异化克服了，人将成为“自为的人”，世界成为“为人的世界”。人将成为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

我在1986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中说过：“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的社会，就是每个人都过百万富翁的生活，这是普遍存在的误解。它的错误不是把共产主义看得太高了；恰恰相反，是看得太低了，因为在这里使用的价值尺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尺度。马克思的着眼点不是‘物’而是‘人’，不是享受，而是创造(创造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的人不是占有得多的“富有的人”，而是充分发展了人的本性的“丰富的人”。马克思是重视物质生活条件的，因为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这不等于说，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正相反，马克思把精神的价值放在物质的价值之上。黑格尔提出，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而精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思想，把自由看做是人的本质。

只有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才能把他的哲学思想和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有机地联系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吃饭哲学”，这是一种浅薄的了解；毋宁说，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革命的哲学，自由的哲学。

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或者害怕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这是对马克思的第五种误解。这种误解在西方很流行。我在哈佛时，有个学生问我：“如果要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之间做选择，他们会选择什么？”他们总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自由，是因为这些国家遵循马克思主义。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这样宣传。在我们国家，“自由”一词在很长时间里是带一些贬义的，好象这是只有西方国家主张的东西。在六十年代，《人民日报》的头版曾出现过一条报道，题目是《管庄——自由王国》。管庄是北京东郊的一个住宅区。你以为它是说管庄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吗？不对。它是说管庄的秩序如何乱，小偷、流氓如何猖獗，卫生情况如何糟，总之，是无人管理，一塌糊涂，这就叫“自由王国”。一个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的报纸，就是这样亵渎马克思恩格

斯的理想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第六种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是轻视个人价值的，共产主义就是“大公无私”的社会，就是集体主义彻底克服个人主义。有这种误解的人，以为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价值标准。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这是不错的；但把个人和集体对立起来，这也是阶级社会的观念。马克思指出，有两种集体，一是“虚幻的集体”；资产阶级国家就是这样的集体，它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冒充为全民利益。另外一种“真实的集体”，它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集体中，个人并不湮没在集体中，而是在集体中得到自由和发展。马克思认为，在他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集体和个人的对立的物质基础已经消除了；所以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既不是“自我牺牲精神”，也不是“利己主义”（《马恩全集》3卷275页）。

当然，我并不认为马克思找到了一条实现这个理想的具体道路，前面已经说过了。

上面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澄清一些误解。这还不是所有的误解，但仅从这些，也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误解是很严重的。我敢说，这些误解，并不是只存在于一般人的心目中，而且存在于一些学者的头脑中。

十九世纪的欧洲，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悲惨命运成为一个触目惊心的问题，作为人道主义者和革命家的马克思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个问题已不再是今天的头号问题了。虽然如此，只要异化存在，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就没有过时。剥削是异化，但只是异化的一种形式，还有其他形式的异化。今天全球性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武器，南北对立等，都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祸害，是人的行为异化的后果。我们今天要坚持改革开放，但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消极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权力的异化，现在金钱的异化也严重起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进步的代价；不要任何代价的进步道路是没有的。但是我們也不能放弃对异化的批判和采取措施来减少这种现象，马克思的思想就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武器。

总起来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也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过时了，他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马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哲学里面，但不是列宁所阐述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也和马克思本人讲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不尽相同。这种哲学，我想称之为“实践的唯一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的人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唯人主义”是我创造的新译名，德文里是 Humanismus，英文里是 humanism。译为人本主义也可以，但我觉得“唯人主义”更好。过去译为人道主义，但这个词的伦理道德色彩太重；这个译名可以保留给英语中的另一个词，即 humanitarianism。实践的唯一主义并不否认自然界的在先性，但是它在解释历史时是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马克思在早期一度自称为 Humanismus，后来他抛弃了这个名称，改用了唯物主义这个词。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马克思改用这个名称的原因和得失，我们也不需要处处以马克思为根据。我只想说，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思想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有生命力。实践的唯一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它既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也可用来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利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我所信仰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实践的检验，有多少错误就否定多少，不必可惜。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也要有完整准确的认识，要把后人加在马克思头上的东西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区别开来。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审查，而不是弃之不顾，好象它根本不存在。官方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为我仍然讲马克思主义而觉得奇怪——这些我都不在乎。

马克思逝世后的这一百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衰落，那么西方国家的科技革命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又使人看到马克思的某些卓越的预见。自动化使人从单调累人的体力劳动下解放出来，电脑则使人从某些枯燥乏味的脑力劳动下解放出来。过去的八小时工作制的理想，已经为现实的每周五天工作制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一些变化，即使没有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但在这种社会中，马克思的若干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恩格斯引用过歌德的这句话。这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适用。据我所知，毛泽东也表达过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产生将近一个半世纪了，现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进步，应当欢迎。我只是想补充两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将永远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它。第二，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发展；这些人可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也可以不是。说得确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灭亡不是简单地消失，而是被“扬弃”。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应当做的工作，就象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黑格尔做的一样：从这个思想的废墟上救出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并加以发展，使之适合当今世界的需要。象历史上许多思想巨人一样，马克思的影响还会长期存在。在一个新世界的多元的文化格局中，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毫无疑问会有自己的位置。

1995年10月

【文摘】

四十三年成一梦，劫后空余百创身

——谈马克思主义哲学¹

李洪林



哲学，有两个问题是值得重新认识、重新研究的。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就是把哲学简单化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这是恩格斯的一个创建）。我对哲学史是不太懂的（若水现在已经不在世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到

¹ 此文是郑仲兵根据他与李洪林的谈话整理出来的，原题《李洪林一席谈》，载《往事》第133期。现题为本刊编者所加，“四十三年成一梦，劫后空余百创身”系李洪林在狱中过64岁生日时，所作七律的尾联。

底哲学上是不是就是一个“唯物主义”、一个“唯心主义”在斗争？这在中国哲学史上就找不到这个现象。多年来，因为有了马克思这个公式，我们这些“哲学家”就回过头来套某某是唯心主义、某某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是好的，唯心主义就是坏的。欧洲哲学是否也是这个样子的？也很难说。

实际上哲学是人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认知，对宇宙的一个认知，包括人自己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和宇宙的关系——这些属于哲学认识、研究的范围。怎么能把它简单到一个唯心、一个唯物就给概括了呢？到现在为止这些问题也还都没有解决。包括宗教。现在世界上一些大科学家还都信上帝，都有自己的信仰，这些事情都不是简单的扣一个“唯心”或“唯物”的帽子就能解释的。

直到现在为止，人对世界、宇宙总体的看法，也就是从本体论方面来看，都是处于研究的过程当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从哲学上来认识世界，只是一种流派，一种观点，是处于中间路程当中的一站，不应该把它当成绝对真理。实质上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自己也还没有这么样绝对化。而后来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它奉为绝对主义。马恩原来批判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弄成一个“黑格尔万能体系”，只有黑格尔自己是对的，是最高的。现在正好倒过来了，马克思主义被说成是最真的，别人都得服从。毛泽东就用这么一种原则来搞思想改造，这叫“统一思想”——这本身就不符合人的认识的发展规律。

第二个就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核心就是把斗争绝对化，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斗争哲学。共产党的哲学确实就是斗争哲学，这个不光是列宁、毛泽东的主张，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儿就种下了这个根。恩格斯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说是你把一个磁铁分到最小那么一块，它也有南、北极——用这个东西来解释世界，证明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一切现象，都是对立、斗争。这也是一种绝对化的观念，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是本体论、方法论的绝对化。这是恩格斯奠定的基础。列宁更厉害了，等到了毛泽东那儿就到了极端了，简单化到了就是“斗争哲学”。共产党最要紧的是团结、统一，而在毛泽东看来党内没有矛盾斗争生命就停止，所以党内斗争比对外斗争还要激烈。要是从根上来说这正属于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的核心。从哲学上讲，对立、矛盾、斗争是存在，而且确实是带普遍性的，但是统一也同样是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的发展并不都是斗争的作用，难道和谐的时候不是发展得更好的时候吗？难道斗的时候，就是革命的时候，把天下打得乱七八糟的时候，那是最好的？具体事例就不用举了。

我就这么一筐一筐地捞，发现很多问题的根子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由创始人留下了这个根源。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掌握政权以后用强力来推行这种哲学，结果给世界造成了灾难。特别是《共产党宣言》里面有“两个绝裂”，要与传统关系彻底绝裂、要与传统观念彻底绝裂，这两个绝裂就把事情整个搞得一塌糊涂。从现象来看当然事物有质变、斗争，对平衡的破坏引发革命，这都是由各种条件促成的，但这只是现象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把这面夸大成极端，结果就变成了“斗争哲学”，歌颂暴力、歌颂破坏。整个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就是受这种哲学的支配，它的力量不得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别的当然你要细讲讲也还有，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两条。需要重新认识，重新研究。他们抓住了这些现象，这些问题不是没有，是不是这么绝对化？这两个核心问题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从理论根源上差这么一点点儿，但它要是这样发展下去就不得了。这个问题至少是没有被彻底的清理过。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历史唯物论”。它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义，指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来研究历史，观察历史，这就叫“历史唯物论”或者“唯物史观”。在这方面，我觉得它有四个问题是值得重新研究的。

一个就是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上，也是把生产力的作用夸张得太绝对化了。实际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和一般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一样，也是很繁杂的。它们之间的作用到底怎么样来表述更符合历史实际？我觉得也还是个问题。“历史唯物论”过于强调物质条件，轻视（如果不是否定的话）思想者所起的作用，而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正因为人有思想，用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因此才创造出历史。当年若水写《桌子的哲学》，就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举例说，“木匠一定要事先把桌子的样子想好”，才可以用这个“思

想”来创造出桌子。所以，这个关系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关系。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实际上历史怎么发展？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怎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八九年如果不是邓小平拍板，能发生六四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人民群众“应该是历史的主人”，但是不是就能够把历史创造出来？这个事情是值得研究。¹

第三个问题就是历史唯物论强调必然性，否定（至少是轻视）偶然性。认为历史必然就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到了一定时候一个社会就变成下一个。实际上历史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东方国家的发展它就无法解释，所以就弄出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正是因为忽视了思想的作用，忽视了个人的作用，所以它才否定偶然性。

六四前我曾经参与了所谓的“十二学者”到天安门广场去劝绝食的学生，那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次偶然性怎么样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事件。当时我们是劝学生回去，因为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要来中国访问。先是找学生代表，请他们先撤出天安门广场，学生的对话要求可以继续研究。学生代表也同意了，但是他们说我们管不了广场的事情，请你们直接到广场去跟学生说。到广场一说，学生当时就一个要求，请赵紫阳或者是李鹏出来跟大家见一面，他们就走（我认为这个当时是可以做到的）。已经是谈到这个程度了。正在这个时候，封从德抢过扩音器，就领着全广场的学生读绝食誓词，最后两句话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个举动煽动性非常大，跟群众运动似的，整个广场潮水一般的声音，就是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吼声震天动地，就把原来谈判的整个结果都给否定了。就那么一个偶然性事件，一个人，做了那么一件事就把事情给改变了。原来我对街头民主还了解很少，这次我才发现街头民主不是民主，谁能操纵群众，谁能把群众煽动起来，谁就能当时决定事情。那个时候谁更激烈，谁就能站得住脚，谁要是说撤出，谁就变成了逃兵，就变成这么一种局面。如果那天能撤走，那就完全不是最后那样了。

¹ 黎澍对此有过研究，

我觉得就像火车到了一个道口，本来可以有转折，转过来会有更好的路走，没有转。所以论述历史发展不能把必然性强调得那么厉害，确实是偶然的事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第四成问题是历史唯物论过于强调突变、强调革命，否定渐变、否定改良。革命还得是暴力革命，和平过渡就是修正主义。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恩格斯讲“用马克思的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这都是名言。把暴力革命歌颂肯定到绝对化的程度，对此多少有些补充、有些怀疑的都是“修正主义”。历史唯物论对于历史的这种解释，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进而形成了一个公式，从思想方法上就给了你一个指导原则，用它来指导行动。这对于个人还无所谓，一个党都用这个东西来搞，不就只能搞出后来那种局面吗？到毛泽东时就更简化了，“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更简化了。但他们这些东西都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根上，理论根源上都是那样的，那是发源地。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掌握群众（那确实能够掌握群众），恰恰因为它的绝对化、简单化、暴力化，从而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特别是在落后的社会、落后的国度里，比如东方国家，很多人都很贫穷的时候，确实是风起一时，别的理论斗不过马克思主义。它是在这么一些哲学观点的基础上，才产生了以后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上面是说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核心就是“剩余价值学说”，我发现它很像是对唯物主义的一个运用。是继承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一切商品都是劳动创造的。可它只承认“物”，就是现实的物，物质的物，承认这个东西有价值，否定精神价值，于是就是体力劳动创造的具体的这个“物”有价值。而否认精神产品，以至于否定脑力劳动。

那是七七年吧，我写过一篇《脑力劳动的历史命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讲脑力劳动的重要性。发表以后接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对我进行大批判。有一封署名“北京市消防队全体队员”，批我说：“你这是给资产阶级说话，你这立场哪去了？”等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否定脑力劳动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公认准则，只承认体力劳动创造

的物质实体是有价值的，因此接着就只承认工人是劳动，否定一切经营管理、科学、文化教育，否定这些是劳动。用现在的电脑语言说就是“只承认硬件不承认软件”。这个确实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面有它的根源。所以你看他们讲的“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就是工人拿着工具对原料进行加工，这就叫生产力，社会就是这么发展的。那么根据这个原理，产生的社会财富呢，就分两部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工人付出的必要的劳动，取得了自己的工资。那么一个产品呢，扣除了工人的工资，扣除了原料、机器的损耗等等以外那就是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创造的就是剩余价值。这么简单一个换算法。别的那些，包括经营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在内，都是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从获取的剩余价值中分出一部分“残羹剩饭”给这些人，其余都是资本家无偿剥夺了的工人的劳动。前后论证就是这么个道理。

根据剩余价值理论，从经济上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是资本？资本就是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货币。所以，资本就是剥削工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用资本工具剥削工人的这么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简单说就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社会化的生产就得社会化的占有，所以后来共产党就搞公有制，这是顺理成章的）。由于存在这个“基本矛盾”，所以市场盲目竞争，就导致经济危机，就必然灭亡。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的病态越来越厉害，将要病入膏肓。其实，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另外一面看，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节点，每逢一次危机，资本出于生存的本能展开竞争，它的生产力就进行一次结构性的调整，就激发出新的生产，新的技术，新的东西出现，生产力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这一面马克思忽略了。他的结论是，盲目竞争产生经济危机，然后财富向资产阶级聚拢，贫穷向无产阶级聚拢，工人不但是相对贫困化，而且还是绝对贫困化，两极分化，尖锐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资本主义确实是那个样子，但是他不能够解释以后的这个社会。现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财富的分配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

恩格斯讲，因为马克思发现了这两条，一个是剩余价值，一个是唯物史观，所以就

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前就有，但是那都是空想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社会主义”。它所谓科学就因为它从剩余价值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推演出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诞生的结论。

那么社会主义怎么诞生的呢？就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实行公有化，搞计划经济，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了。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的经济危机和工人贫困化的背景下，确实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从而得到很广泛的传播。

到了东方，虽然俄国、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经过充分的发展，但是穷人多，这马克思主义就是鼓动穷人造富人的反，搞共产，搞平等，当然大受欢迎——恰恰在越落后的地方越容易得到响应。它也没有更高深的道理，就是这么两条：穷人造富人的反，共他的产：咱们大家共同来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都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的政权，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上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实际上掌握政权的是党，是领袖；在经济上，把全国的生产资料都集中到当权者的手里，所谓“公有化”并不是像马克思说的把它还给社会，而是收归国家，实际上都集中到共产党的手里。共产党掌握着全国的经济资源、所有的政治权力，建立了空前极权的国家，就是所谓“一元化”。正像列宁所形容的，整个苏维埃就是一个大机器，每一个人都是它的螺丝钉。这种社会就完全变成消灭了人的所有的个性的金字塔形，并不是原来所设想的什么平等的、自由的社会。它本身也就丧失了活力。中国共产党用的最多的动词就是“抓”，什么工作都靠“抓”，一级“抓”一级，你不“抓”他就不动，整个社会是停滞的。而所谓“计划经济”，这倒是马克思原来的设想之一，让全社会能够自觉组织生产，所谓“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地发展起来。实际计划经济恰恰是最无计划的，都是掌权者个人脑袋里的东西。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这么复杂，人的需要又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做到有计划，最后都会变成短缺经济、亏损经济。政治上的平等当然就不要说了，那根本就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就是

捆在一起穷。所以，社会主义就变成贫穷的一个标志。

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一篇研究苏联、东欧垮台的文章，说是西方和平演变使得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最后大家抛弃了这种体制，社会主义阵营也就瓦解了。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制度本身让人们厌倦了，是出自这种内在的力量。至于外在的什么和平演变，什么自由欧洲、美国之音起不了那么大作用。

从社会主义的实践结果再回头来看所谓“历史唯物论”。历史，即使按照历史唯物论所讲的，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前几个社会都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形态，没有哪一个人说咱们进行一次什么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革命吧，然后组建一个革命党来为此奋斗，然后就建成一个“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把社会形态叫成几个名字，一个一个把它弄成几个阶段，这大概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搞清。比如谁先把那个社会叫做“资本主义社会”的？我问过好些人，比如苏绍智这都是专门研究经济学的，他们都找不出这个答案来，我估计可能就是马克思开始。这就是一个社会嘛，为什么要给它一个名呢？什么主义？奴隶社会会不会就是这几个皇帝、这几个国王就说我这就是奴隶社会？

我自己知识面太窄了，不清楚，问过好些人也都没找出答案。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我觉得不能按照一个图样来创造新社会，历史证明了这是完全失败的。列宁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他说：“社会主义不是像蛋糕那样能够按照一个图纸来定做。”（大意）然而列宁自己却正是在“定做”一个社会主义。不仅列宁，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按照“图纸”来建设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开始就这么设想，什么“按劳分配”、“各取所需”，其实都是空想。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每个人拿到一张劳动券——你怎么样衡量劳动呢？美国的盖茨你怎么去衡量他的劳动呢？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造电脑的工人才算劳动，可没有盖茨有这些吗？爱因斯坦的劳动你怎么给他算？根本算不出来。

按照一个图纸来创建新社会，是绝对失败的。莫尔跑美洲去搞一个共产主义公社，结果是用自己的钱去养这个公社，不是垮了吗？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把全部的资源都掌握

在自己的手里，按照预设的程序来搞，把全国变成一个大机器，它来指挥一切、控制一切，结果怎么样呢？没有一个社会不是死气沉沉，发展不下去了，最后垮台。中共搞的这个改革，好像多么了不起，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就是不断的放松控制。放一点就发展一点，放一点就发展一点，将来都不管的时候，那就完全市场经济了，就整个的好起来了。什么改革？好像是多么伟大的创举似的，无非是把那些被你束缚的东西，逐渐解开就是了。现在经济上敢解了（但有些还不解，垄断的集团它就不放松），政治上却越来越紧。只要是逐渐放松，这个社会就会慢慢活起来。

我觉得恩格斯讲社会历史发展是“合力”的结果，是“平行四边行”，是有道理的。就是各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去往某一方面使劲，那么结果是谁的目的也达不到，无数分力成为一个合力，这个社会是这么走的。这是对的。

这是我大体上想到的一些问题，把它提出来而已。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两块基石、一个结论，都得跳出框框，重新研究。■

【文摘】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

何方

一、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清楚

马克思主义诞生将近二百年，我们先后把它定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有几十年了。但是直到文革的拨乱反正期间，邓小平才说了一句老实话：“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就以我个人来说，我是从小就学习和笃信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也读过不少，还给人家上过课，但实际上是一直没有弄清楚。不但作为学说，许多问题是模糊的，跟着领导人云亦云；一联系到实际，那就更糊涂了。

例如大跃进、反右倾、饿死人、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瞎胡闹，内心实在不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也不敢有个人的独立思考。比起一些先知先觉来，自己只能算一个随大流的落后分子。只是在改行学历史后，才对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历史与现实问题做了点儿稍微系统一些的思考，现在所能谈的，就只是近年来的想法了。

其实，邓小平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清楚的“我们”，主要指的显然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他自己那些参与中央领导核心的人，特别是一言九鼎的毛泽东，像我这种跟着跑的小不拉子大约并没有包括在内。而且他对毛泽东的评论也还有别的例证。1985年他曾对外宾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而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

邓小平说的“我们”没看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除了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局限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缺陷以外，还由于中国领导人并不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例如毛泽东就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资本论》（刘、周、邓以及主管意识形的陈伯达、胡乔木也都没读过），主要看的是马恩前期几本小册子如《共产党宣言》。加之他们不大了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历史和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和先期国际共运中的斗争，特别是对第二国际和民主社会主义缺乏研究；也没有多研读马恩晚年的著作如恩格斯的《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等。他们不但没弄清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不少曲解、误解、片面化、极端化、僵化、教条化，加上深受中国专制主义和历代农民暴动的影响，结果就造成实践中的专断、蛮干、胡来，严格的等级制度，以致大搞个人迷信等等，反而把这些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结果就闹得许多地方自相矛盾。

例如，既然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弄清楚，又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怎么可能说他是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人都必须坚持？

对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没弄清楚，现在是不是弄清楚了？看来未必，可能是更模糊了点，有些还是为了维护执政地位故意搞模糊的，特别明显的是表现在造神、造假上。

又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人的自由发展，这是恩格斯经过深思熟虑的回答。可是我们能谈得上吗？如果单就言论出版自由来说，那么从实行改革开放、进行拨乱反正那段时间算起，不是恰恰相反，许多方面不是收的愈来愈紧吗？这大概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的。

作为抽象的名词，民主还可以在报刊上经常见到，甚至允许作点儿不关痛痒的讨论。但是涉及自由，就连空泛的谈论也几乎见不到了，更不允许讨论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的思想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问题。这些词汇已日渐从报刊和其他印刷物上消失。由此可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规定为全民必须坚持的信条，但实际上却并没有执行甚至也不想执行。我们执行的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当年从苏联搬来的斯大林主义（主要是政治模式，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后已基本放弃了）。因为正像有些人所说，以系统的理论衡量，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毛泽东思想，它只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几点看法

虽然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至今仍然不十分清楚，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实践和反思，也可以作出以下几点判断，向方家请教和参加讨论。不过这里着重谈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中心课题，而不多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其他领域。

1. 马克思主义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

人类有史以来，就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其含义虽然各地区和各人群并不一致，但是许多因素还是大同小异的，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均富等。这些自古以来就有的理想，先后形成各种学说和信仰，不管叫什么名目，是大同世界还是乌托邦，但都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到19世纪初，具有社会主义理念的不同派别就先后兴起，在欧洲形成了日益广泛的运动。不过开始阶段，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不但派别纷杂，而且思想混乱，什么货色都有，不光是都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还多

为一些不同的封建贵族、宗教派别和资产阶级所利用。所以为了划清界限、不同流合污，马克思、恩格斯在初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时有意避开使用社会主义，而用共产主义这个词。他们起草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就取名《共产党宣言》。

直到20多年后，马克思的思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逐渐处于优势时，他们才更多地使用社会主义，而很少使用共产主义了。对此恩格斯曾做过详细解释，在他的领导下创建和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党也都以社会主义命名，如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等。兴起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到恩格斯晚年即已开始进入高潮。由于运动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和推动下发展起来，所以恩格临终前不久，曾既高兴又不无惋惜地说，马克思如果能看到这种盛况该多好呀。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运动从19世纪末已呈燎原之势，到20世纪更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苏联东欧的变化，只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派别的衰落，而整个运动仍在蓬勃地向前发展着。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也是对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不算长时间里，战胜社会主义运动中其他流派，处于优势和领先地位，首先因为它是在当时欧洲几门先进学说的基础上，空前地集中、提高和发展了历来社会主义运动的要求和理念，就是解放全人类，求得人的自由、平等、博爱、均富，建立起一整套站在时代前沿的理论体系。也由于这一理论是一门科学，目的在于拯救无产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因此自然会得到他们以及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拥护，成为这些人的信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的学说特别强调理论和实际的联系。他和恩格斯直接参加和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并执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学说，使之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接近真理。所以不论人们怎样评论，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谁也不能否认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不但工农群众，而且连西方学界也一直敬重马克思，一再自觉自愿地推举他为“千年第一学人”的原因。

2. 马克思主义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主要还是在探索真理，并没有说已经穷尽真理。所以不能说它是“科学的科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是科学，就应该进行研究和经过实践的检验，凡证明是正确的，当然应该坚持；证明是错误的，就必须加以修正和扬弃。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必然受到那个时代的限制，一些观点以至基本原理的错误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本人就在对他的学说进行着不断的修正，后来恩格斯独自领导工人运动的12年中更有重大的修正和发展。无怪乎一些人说他们的学说存在着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

有些人只记得《共产党宣言》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强调两个“彻底的决裂”。其实马克思老早就认为在一些民主国家如英、美以及荷兰，可以实行和平转变，经过普选，工人阶级就能取得政治统治。到了1874年，恩格斯更进一步认为，“暴力革命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了”，“只剩下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十年后，他更直截了当地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1848年时提出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陈旧了”。面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自我调节，他还承认，“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可以通过普选和代议制等民主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原话是：“旧社会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他也不再坚持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主张继承其立宪和共和制度。恩格斯不只在理论上修正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同他的朋友和学生如伯恩斯基、考茨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普列汉诺夫等，创建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在实际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运动引向高潮。

在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的同时，还必须承认它只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流派，既不是处在高于其他流派和垄断整个意识形态的地位，更不能使其政治化，成为人人必须坚持信奉和服从膜拜，而不能怀疑、讨论、批判和扬弃的教义。任何学说只要被置于高于

一切的垄断地位，加以神圣化和政治化，那它就会丧失科学性，宣布自己的死亡。

3. 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所写《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的专论中，就提出过不能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因为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实践检验，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些根本性的修正，并且证明这些修正有不少是错误的。

中国一直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列宁斯大林主义。中国革命的遭受挫折和走了弯路，特别是头28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有空想的成分和“左”的倾向，而列宁主义走得更远，以至使它和马克思主义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脱节。下面我们就列举两者之间一些主要的区别，只是点到为止，不做旁征博引和详细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和理论体系。而列宁主义只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一个“左”的流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旨在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人的解放，恩格斯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归结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列宁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斯大林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列宁本人1920年12月10日回答西班牙代表团的提问时也说：“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必须以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和物质极大丰富为前提，因此只能发生在社会主义胚胎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列宁认为可以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较为落后的东方国家俄罗斯首先实现。

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进行和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解放只能是国际事业，一国单干必成为笑柄；列宁主义则认为，所以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并向世界输出革命。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曾说，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已经过时，马

克思本人如果健在也会加以扬弃），马克思主义当初所提也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且只适用于国家消亡前的过渡时期。列宁公开主张的却是少数人（指俄国的产业工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进而成为一党专制和领袖独裁，并且“只要其他社会成分还没有服从于共产主义要求的条件，这一专政就将延续下去。”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到了后来，特别是恩格斯晚年，已慎言暴力革命，而大力提倡争取普选权和代议制，主张改良、渐进的“和平演变”。对于这些，列宁持批判态度（有些重要文献如恩格斯的《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列宁在世时没能看到）。

1919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彻底分裂后，主要分成两大流派，一是宣布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国际和各国工党、社会民主党，一是宣布实行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双方都承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开头时还都自封“正统”，但却互不承认，势不两立。

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差别当然不止这些。对许多差别，过去说成是列宁的发展，现在看来并不妥当。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列宁熟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那时已经公布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消灭私有财产和实行计划经济等，都是继承和坚守的。因此只能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不能说它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而且列宁在世时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称谓（近200年国际共运中以活人命名学说的只有毛泽东一人），后来的列宁主义是斯大林的定义和系统化，还同马克思主义连成一个单词——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不断把自己的思想追加进去，使它实际上成了列宁斯大林主义。现在有些人为了替列宁开脱，把坏事完全推到斯大林头上。这不但不公正，也不合乎事实。■

此文选自《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明报出版社，2007）

【文摘】

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

张宣三



马克思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中观点是不断发展的。早期、中期和后期有明显的不同。从本质上讲，马克思的学说是对人的关注。马克思早期的研究重点在于人的自由、发展和人道主义，他的关于人的学说与西方的传统有继承的渊源关系，也可以说是西方关于人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德国哲学继承了启蒙运动关于人的自由的学说的传统，马克思则继承了德国哲学的传统。黑格尔说“人的本质是自由”，马克思也确认“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并且对人的自由和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人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这只有“人在自由中才有可能”。“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里所说的还给人自己的“人的世界”是人能够在其中自由行动的世界，而还给人自己的“人的关系”则是人自由联合的关系。人的本质是自由而在历史中却陷入不自由，这正是马克思所关注的焦点。

正是由于这个原故，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来研究人的本质和为什么人被异化以及如何消除异化的问题。马克思以对人的极大关怀研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得出劳动和人被异化的结论，指出在这种剥削中，劳动成为别人“在内体上折磨自己、在精神上摧残自己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失去了通过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来实现自己发展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生产得越多，自己能够得到的就越少，就越贫困，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大，工人所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己异化的力量也就越是强大，人越是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也就没有自己的目的”（以上所引都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这与康德所说的人是目

的、不是工具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认为,消除劳动的异化以达到消除人的异化,还人以自由。使人能够在自由中发展自己。这就是回归人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这种人的本质的回归就是回归人本来的“自然状态”,也就是回归“人的自然”,这种人的回归就是人道主义的实现,而人道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所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这与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人的自由联合以及在这种自由联合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在如何消灭劳动和人的异化,马克思陷入混乱。马克思在其早期研究中曾认为,要解放劳动必须依靠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才是“解放劳动的第一条件”(《马恩全集》第一卷第134页)。只有在生产高度发展的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合乎人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同上第16卷第271页)。马克思还说过,共产主义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才能实现,不主张过早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所有这些思想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然而,马克思却又把劳动的异化归因于私有财产,因而消灭私有制就成为消灭劳动异化的手段。“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从而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马克思把私有财产说成是异化的原因,因而把消灭私有财产作为消除异化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造成了理论上的最大混乱。自从马克思提出异化的理论到现在,一百五十年已经过去了。事实证明,在生产还很低的时候,对私有财产积累的欲望曾经激起无止境的贪欲和残酷剥削,然而私有制度并不是这种残酷剥削的根本原因,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才是残酷剥削的真正原因。消除剥削和异化只能依靠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自己也说过了。因为越是生产力水平低,资本家才越是依靠非人的剥削来榨取剩余劳动,劳动的异化就越严重。生产力发展起来以后,人们就不再依靠增加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来榨取利润,而

是越来越多地依靠人的知识和人的创造能力的发挥来实现生产的发展，创造利润，创造财富，而这只能在人的个性的解放和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它现。因此，消灭异化不是靠消灭私有财产所能办到的。事实还证明，对私有财产用暴力剥夺，以此来实现共产主义，只能造成暴力的统治和占有，把人当成暴力奴役的对象，使人更加失去自由，其结果只能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和新的私有制的产生，人的更加严重的异化。

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看成劳动异化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源，因而出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同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接着却说：“几十年来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的历史。”果真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而资产阶级的统治到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还不到一百年，显然是难以解释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的错误还反映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分析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关系，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正是马克思这种失误，导致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产生。在巴黎公社起义之初，马克思是不赞成的。在起义失败后，对于公社社员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牺牲精神是应该赞扬的。然而，在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对比，巴黎公社起义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却不是冷静地分析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关系，找出真正失败的原因，以此来制定今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而是把失败的经验归之于对资产阶级的压制不够，从而得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且把这种战时的经验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种下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晚年也已发现他们在前-时期所做的那些理论上的总结是

不正确的。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说过，中产阶级已经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谈到阶级关系时，马克思认为，在英国，“中间的过渡阶级模糊了阶级界线”。在《剩余价值论》中，马克思说：“里加图忘记的是中等阶级人数不断增加，……日益占有重要地位”。在谈到马尔萨斯时，马克思说：“他的最大希望，……是中等阶级增大而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减少（即使绝对数量是增加的）。事实上，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恩格斯在晚年也已发现原始积累时期那种残酷剥削的阶级对立的敌对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在他去世前三年为他在四十二年前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中指出：四十二年前“所描述的情况（指非人的残酷剥削），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已成过去。“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反映在政治上，对民主选举制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从反对变成赞成参加。在187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把民主普选制说成是“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压迫人民”。到1880年，马克思在写德国工人党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中，就把普选权看成“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成解放的工具”。恩格斯在《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中说：“工人群众越来越清楚，他们的出路……首先是在于组织成独立的政党的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力，争得议会”。在1894年《致奥地利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中说：“在奥地利，问题是要争得普选权”。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估计，如果天假以时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许有可能对他们过去所做的那些论断做出修正的。事实上，这些修正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就有人替他们做了，这就是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是恩格斯的晚辈。曾与恩格斯共过事。伯恩斯坦根据当时德国工业发展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和阶级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对马克思的理论做出一系列修正。伯恩斯坦从当时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增长与相继而来的生产社会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现象出发，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正在获得自我调节的能力；社会不是走向两极分化而是中产阶级的规模越来越大。因此，资本主义必将走上一条“任何阶级都不能享有同整体对立的特权”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将“使工人从

一个无产者的社会地位上升为一个市民的地位”。而且还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的继承人”。自由主义“在事实上表现出一个更加深远得多的普遍原则。这一原则的完成将是社会主义”等等。从今天看来，伯恩斯坦所做的许多修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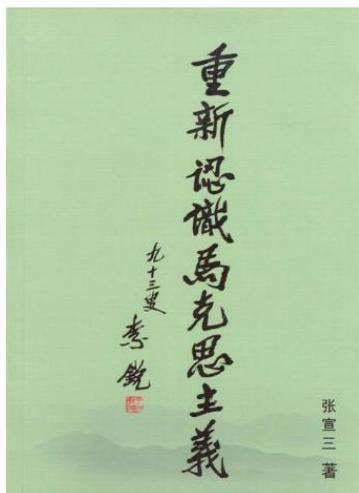
马克思那些论断中失误的方面，不但被列宁所接受而且被列宁加以极端化。把马克思的学说改变成适合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为他在沙皇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一个血腥压制和领袖专政的极权主义的党和国家做理论上的辩护。他把资本主义说成是腐朽的和垂死的帝国主义，极端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把国家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用来镇压某一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链条中最薄弱环节上爆发等等，为他在农民占绝对多数、工业还处于原始积累时期、工人还是来自农村不久以前才穿上工人工作服的农民沙皇俄国进行一场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作辩护。

由于马克思理论本身所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很快分成两派，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东方的极权共产主义。西方社会民主政党继承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传统，从关心人的自由、平等、公平出发，要求保障工人的权利，保障就业、推行工人参加企业的管理和决策，推行普遍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等等。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作为自己要努力实现的目的。而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则很自然地成为东方许多落后国家进行农民革命的理论工具，阻碍了这些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且把伯恩斯坦和西方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斥之为修正主义。本来修正一词没有任何褒贬的含义，自从列宁把它用之于贬义以后，修正主义就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文摘】

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

余 孚



如果说，在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传入中国以前，阻碍我国历史前进的是我国的纲常伦理价值观，那么，从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阻碍我国历史前进的则是两者的溶合。

我国历史的绝对落后于世界历史进程是从明代开始的，而这正是纲常哲学在中国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我国明代历史开始于 1364 年，亡于 1644 年，这个时期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时期，欧洲的文艺复兴推动了世俗文化的兴起和个人主义的发展，重视个人的理想和个人才能的发挥，为人的解放和欧洲的近代化的到来开拓了前景。我国明代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发展虽然不及欧洲，但仍然使明代成为开始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但这种萌芽枯萎了，对我国的进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但如此，我国历史上政府机构绝对官僚化和彻底腐败也以明为最。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是清代统治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开始，到美国独立和欧洲一些国家民主革命的完成以及工业革命完成的时期，是西方从近代走向现代化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纲常伦理和宗法家族文化牢固统治中国人民头脑的时代。历史在中国完全凝固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但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丝毫改变，从小农经济到宗法家族统治到纲常伦理价值观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系列全部没有触动，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很微弱，还没有使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力量，迎来的只能是军阀割据和混战，重复我国历史上传统农民革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局面。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遇到很大的困难，势单力薄，一筹莫

展，不能不借助于国共合作来改变局面。主张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虽然从政治运动开始，却不能不以文化运动告终，在我国文化革新方面取得了成就，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微弱的。蒋介石虽然割据苏沪浙一带资本主义发达最早的地区，也没有可能利用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继续推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榨取江浙资本家的财富为他自己统一全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提供财源，不但脱离了资产阶级，而且脱离了知识分子和农民，而所依靠的反而是中国的地主阶级，这就预示着蒋介石的失败。

当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束手无策时，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已经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接受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紧紧依靠当时占全国人口90%的农民，以马列主义为号召，适时提出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吸引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和向往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建成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但坚持抗战，而且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战败蒋介石，第一次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并且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在第一个五年内建成了以156个重大建设项目为内容的工业化初步基础，使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曙光，成绩十分巨大，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然而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文化传统仍然紧紧地掌握着我国的农民革命，加上小农生产者的幻想，使中国重新陷入苦难，不但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到破坏，一个一个的运动接连不断，使秦始皇“弱民”、“强政”的残暴统治得以再现。特别严重的是陷我国于长期落后和愚昧的纲常伦理得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复活，重新统治着中国人民的头脑，对于阻碍历史的进步影响更加难以估计。

纲常哲学把皇帝的个人专制说成是“天理”，“君为臣纲”是“天理之自然”，“心之本然”。顺从皇帝的意志就是顺从“天理”，对皇帝的不忠就是最大的“逆天悖理”，就要为世所不容。皇帝享有的权力是无限的。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就是体现了“天理之自然”，也就是符合“天理”，皇帝永远圣明，即使愚昧残暴，或者荒淫无耻，失去人性，也仍然圣明，不能违背。因此理学家特别强调整节义。“为君尽忠，为父尽孝，为夫尽节”。这是纲常伦理的最高标准，是每个人修身的最高境界。

极权共产主义则把领袖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客观规律。“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的职务的称之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主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就是说，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在无产专政中的这种关系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必然要出现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通过共产党的专政来实现。共产党的专政只能由党的领袖集团，最后由领袖个人的专政来实现。于是领袖就成为阶级专政和党的专政的代表，领袖的专政就体现了阶级和党的专政。群众处在专政的底层，领袖则处在专政的顶点，成为专政的绝对权力的化身，于是维护领袖的绝对权威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所在，党的利益所在，每个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革命的“本然”。实际上党的领袖从来就不是真正选出来的。列宁虽然加以粉饰，说成是被选举出来的，但他马上又承认，在革命急剧发展的时候领袖不可能都由选举产生，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领袖根本就不是真正选举出来的，而是由前一代领袖挑选出来或者利用权术，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得出来的，从而强加在党的头上，并且通过党的专政强加在人民头上。领袖一旦挑选出来，就成为合法的继承人，立即获得超出一般人的绝对权力，这与封建皇朝的世袭制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思想统一是历来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件十分重视的大事。朱熹的纲常哲学一经出世以后，历代皇朝就把朱熹注解的《四书集注》和朱熹本人的著作作为巩固皇权的唯一思想工具。不能有丝毫违背。纲常伦理的深入普及对于巩固我国封建极权统治的顽固存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极权共产主义对于思想的统治，其重视的程度如出一辙。极权共产主义的每一代领袖一旦被挑选出来，都十分重视把自己打扮成理论的权威，一切党的理论必须出自领袖，一切事务都要由领袖做出理论上的解释，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当成理论广为宣传，供大家学习。领袖掌握着理论，如同宗教主掌握着宗教教义一样，不容许有任何其他不同的解释。与领袖的解释不同的任何观点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都是离经叛道。必须严惩。

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为害之大是十分深远的。极权统治只允许一个人思想，剥夺了所有人的思想权利，其结果使所有人的智慧和创造才能被压制，实际上是压制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断送了一个民族进步的活力。我国是一个有着辉煌文化传统的国家，然而我国又是一个在思想和学术上严重落后的国家，我国文化的先进仅仅表现在从春秋到战国五百年思想自由的时代，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然而，两千多年全国统一所导致的不是自由思想的继续，而是高度的思想压制。这种思想的压制不断地加深，使我国经历了从三纲哲学的思想统治到极权共产主义的思想统治，当全世界的文明进步发展得越来越快，学术和科学的发展和各种学派的发展如群星丽天的时候，我国却是极权对思想和学术的统治越来越严密，形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不但如此，对思想的绝对统治必然要对来自其他方面的思想进行排他和封闭。而且越是绝对统治，就越是绝对排他，也就越是绝对封闭，不允许除统治者的思想以外的任何思想进入他的思想领地。人类的文明进步不但需要多种学派学术的发展与交流，而且需要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互相吸收、取长补短，以此来丰富思想文化。没有文化的交流和互相融合，没有思想的多元化发展，必然落后，排他与封闭使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脱离世界文明进程。这正是我国在世界进入近代和现代文明，世界学术和科学技术越来越昌明而我国却长期处于专制落后的状态的惨痛教训。我国今天市场虽然已经开放，而思想上却仍然是清末所实行的闭关自守，这种情况绝不当再继续了。然而事实上我国建国半个世纪以来，排他和封闭却丝毫不见减轻。当然，极权共产主义的排他和封闭不是从我国开始的，但我国极权主义的排他和封闭比之列宁和斯大林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超过。

列宁把不同于自己的观点斥之为修正主义和叛徒，斯大林进一步实行人身消灭，毛泽东发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时把与自己思想有出入的观点都上升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阶级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进行人身迫害。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思考 and 判断是非的能力，是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然而这都是极权统治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很自然成为打击的对象。建国以来一系列的运动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从批判武训，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直至文化大革命，把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其规模之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一旦扣上帽子，不但工作权被剥夺，甚至弄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生存权都没有了。使知识分子感到人人自危，把知识分子训练成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唯唯诺诺、逆来顺受、曲意奉迎、不敢有丝毫违背。把做人的尊严、人的个性、知识分子的气节都消磨尽净。使人失去自信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良知受到严重挫伤，使人成为唯命是听的精神奴才。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才能被摧毁，民族生机被挫伤，把中国变成文化荒漠和思想贫弱的国家。我国建国以来在思想和文化上所遭受的伤害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

余孚是张宣三先生的笔名，以上二文选自他的自印书《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域外之声】

寻找真实的马克思

——马克思研究专家史傅德与《财经》记者的谈话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想法，无论是对是错，其影响力均超过一般人的理解。自认能够完全不受知识影响而偏重实务之人，其实经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可是，随着历史渐行渐远，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的形象就像雕塑一样固定下来，令人仰望而难以接近。幸好，马克思留下来大量的手稿，可让后人深入了解一个思想家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手稿的流传过程非常非常复杂，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史傅德（Fred E. Schrader）先生说，“最初给了恩格斯，恩格斯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总

部，193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它们交给了荷兰社会历史研究所。现在这些手稿已经全都电子化了，可以在英特网上找到。谁愿意研究都可以去看，只怕没人看得懂，因为马克思会几种语言，而且有很多缩写，还有他自己创造的写法，非常难以辨认。”

作为德国著名学者，史傅德是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人，也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学者。史傅德的毕业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马克思1850年到1860年思想转变的手稿。2002年-2012年，他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编委会成员，负责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心得。

在上海巨鹿路的一家咖啡馆里，史傅德先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详细讲述他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认识，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马克思。

为什么 1850 年后马克思开始反思？

《财经》：马克思虽然在中国知名度很高，但是毕竟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人物，所以普通中国人对他个人并不了解。您在大学里上课，学生们对马克思感兴趣吗？

史傅德：我教中国学生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接受真实的马克思。其实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他使用的所有资料和信息都是19世纪的，但是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不局限于要解决19世纪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这两者是脱节的，好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和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是比较现实的，他要解决19世纪的社会民主党、银行国有化等问题。马克思在手稿里写道，这些行不通。马克思有大量笔记手稿，许多话题并没有和恩格斯讨论，也没有发表。通信讨论的还是两个人比较一致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在和恩格斯讨论当中，不断在试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在笔记里想得更深，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财经》：传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看来并非如此？

史傅德：他俩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思想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0年代他们是亲密战友，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手稿看，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还互相评论。但是1850年以后明显分开了。

马克思是真正的学者，他不断在进行思想实验，也不断在试探恩格斯，看你到底能懂到什么地步，能够沟通到什么地步。可是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所以1850年以后两人思想上已经有了分歧。但是在感情上还是一样，只是理论上求同存异。马克思自己继续思考探索。

《财经》：思想上求同存异，这种朋友很难得。

史傅德：他俩感情上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恩格斯知道马克思是个奇才，他也需要这么一个奇才。马克思也需要恩格斯，因为恩格斯是真正的行动的政治家，马克思根本不能付诸行动。另外恩格斯也确实在财力上支持他。

《财经》：您说马克思从1850年后思想发生转变，可是上世纪8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人们突然发现，好像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是不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要更早些？

史傅德：《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的阅读笔记，档案中看到的不是一本书，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是哲学思考。这本书1932年第一次出版，然后大家就忘了。到了1950年代苏联解冻时期，又被重新发现，拿来反对斯大林。马克思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个人，西方学者也拿这个来反对斯大林专政。这种观点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有冲击力。这本书一次次被拿出来事，这种现象特别有意思。

在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主张。列宁特别欣赏这一套，列宁主义就是沿着这么一条线发展起来的。可是1850年之后，马克思进入反思。

《财经》：为什么这时候马克思会反思，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因素促使了他的转变？

史傅德：首先是1847—1848年和1857—1858年两次经济危机，马克思忽然认识到，

这不但是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金钱分两部分，10%进入个人消费领域，90%是债券、股票等资本运作。和过去危机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政治革命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从此以后，经济危机不再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在马克思这里开始出现。其次，法国1848年革命以后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政治经济基础是国家银行、重工业、信贷银行等。马克思原来认为，这个帝国不可能持续，早晚垮掉，由无产阶级掌权。结果与他的预料完全相反，法国社会越来越稳定。这对他的震撼非常强烈，也促使他开始反思过去的那些想法。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和蒲鲁东针锋相对的斗争。蒲鲁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其实支持拿破仑第三。马克思要回答蒲鲁东的理论，就必须深入思考。

“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

《财经》：从资料看，当时恩格斯坚持政治家的实践性，甚至身体力行去练骑马射击，准备打仗。

史傅德：马克思钻到他的思想实验室里，转向经济学、金融研究，研究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在此之前他不是经济问题专家，真正进入研究之后，才发现和原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财经》：概括地说，1850年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什么转变？

史傅德：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把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政治革命打碎的。

《财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怎么看呢？

史傅德：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从来没有给出结论。如果说有结论，就是：第一，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拿破仑一世、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第二，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

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他非常辛辣地来嘲笑说，你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它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腐蚀他，是政治家自己积极被腐化。

《财经》：马克思讲得特别精彩、特别重要。他有没有预见到计划经济？

史傅德：他说，理性或合理的市场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乌托邦，并不是说国家来介入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他根本不能认同后来苏联的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身演进，最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

《财经》：那么，马克思对私有制持什么样的态度？

史傅德：认真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甚至在共产党宣言里，他都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手稿里，他特别讲私有制在18世纪对社会推动和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私有制才能被全社会所接受。还有，私有制对个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哪怕你是个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个自由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如果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所有制本身就不再是私有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制就成为一个悖论了。

《财经》：私有财产超过了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变成社会公共财富。但是它并不是以政治的方式变成公共财富，而是自我演化的内在逻辑。是不是这个意思？

史傅德：金钱变成资本，资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循环体系，私有制其实就异化了。私有财产不再私有。马克思并没有只说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说私有制有一天会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而且私有制超越到一定程度会否定国家，而不是说通过国家干预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社会有一种自我繁殖、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有一天社会生产将超越社会、超越个人利益、金钱、资本，但必须是社会自我繁殖，政治外力不可能超越它。

“马克思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财经》：马克思在1850年代之后，参与过现实政治活动吗，参与到什么程度？

史傅德：他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起了理论引导作用，很谨慎地参与，真正参与的是恩格斯，当然他们是互相沟通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纲领是马克思起草的，但是这些纲领把他的想法简化了，二者之间有落差，也可以说是矛盾的。

《财经》：不过对于1871年发生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很快就写了一本书《法兰西内战》，说明他还是关心现实政治的。

史傅德：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就写了《法兰西内战》，实际上是即时的反应，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没有经过缜密思考。巴黎公社之后，是不是无产阶级掌权了？全是猜想，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和充分信息。

《财经》：在此之后，马克思对有些基本判断是不是有过修正或者校正？

史傅德：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因为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再一次转移到经济问题上。但是能看出来，他越来越认为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国家不能占上风，不能是强者，政治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越来越反对政治控制经济，而恩格斯还是强调国有化的重要性。

《财经》：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则，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公有制等等，这些东西难道不是马克思学说里面的内容吗？还是说，马克思思想里面本身也充满了巨大矛盾？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其实从来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从来没有完结。例如，《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恩格斯整理定稿的。后来德国马克思全集研究小组发现，恩格斯编《资本论》第一卷把它浅化了，甚至加了很多政治内容，其中一些和马克思手稿里的内容甚至是冲突的。也不能说恩格斯是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权威的《资本论》版本其实是没的，因为马克思自己留下了好几个开放性的选择。

《财经》：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史傅德：因为马克思留了几十本手稿，恩格斯又把好多不理解的搁到一边去，觉得哪个更适合自己，就选择了哪一个。考茨基、列宁都觉得恩格斯的版本特别好，因为里面线索很清晰：先有生产，然后有交换，剩余价值，把这些都消灭以后，社会主义实现，所以他们就沿着这条线拼命往下走。但是看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着这条线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观理解。

《财经》：列宁描述的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次比一次大，到最后大爆炸，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承认这个观点吗的？

史傅德：特别是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总崩溃的结论。他说要改变一个社会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其结果，马克思自己排斥的观点，最后却被考茨基、列宁强化。

《财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矛盾有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史傅德：没有。在他看来，按照内在的逻辑是不可能解决的。在现行体制中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进入资本的运作必然多少年再来一次经济危机。用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他也觉得不可能。必须走出这个体系和逻辑才能解决。但是他说，我没有想出来怎么办。

“马克思是极端的天才”

《财经》：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什么？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研究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包括电力、化学、文献学、生物学、地理，甚至他对数学也有兴趣。他有三大本历史手稿从古罗马社会一直到英国革命，他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

《财经》：通过阅读手稿，您认为马克思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对这个人是怎么评价？

史傅德：马克思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实验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但他研究得出来的结论符合今天社会的一些情况。如果好好读马克思的话，特别是他没发表的东西，都能看到他真的有一种预见性。例如，中央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的作用——这些是19世纪没有发生的，马克思的手稿里完全推断出来了，而且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马克思是一个极端的天才，或者是一个天才式的“疯子”，毕生的精力都在寻找一种他不可能得到的结论。从天才性来说，他可以跟黑格尔相比，他思考的层面已经触及了可能的边界。所有他之后的政治家，或者是在他的这条线上思考的人，都没有到达他的高度。

《财经》：怎么理解马克思思考的边界？

史傅德：对马克思来说有两方面，一个是 he 想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实际是什么样的，这是可触及的、相对物质层面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人的精神和思考的临界点在哪儿。他一直在研究人类意识的形态的演变，结果是相互矛盾的，这是他所触及的临界点。

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马克思都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其他政党宣扬的马克思。真实的马克思不是后来被描述的，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后来列宁他们塑造的那样。

《财经》：其实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很多德国年轻人阅读后，兴奋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知道后气愤地说，我什么都是，但我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史傅德：确实，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没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没人理会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因为不想接受。

马克思主义者都说，马克思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不可分的。但是，政治家必须是可交流的，必须有听众，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大部分东西里是无法交流、无法让听众马上明白。从这点上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家。特别是阅读他的手稿以后，我真的不能把这两者捏在一块，完全是两个形象。

《财经》：既然不是政治家，马克思也不应该为后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负责？

史傳德：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革命、暴力革命之类，这些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1850年代对英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以后，就像前面谈到的，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马克思主义和后来发展下去的那些理论是另外一个历史。它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延长线，而是衍生出相对独立的另外一条历史线索。作为思想家，马克思不能、也不应该为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负全部责任。

文中的下划线为本刊编者所加，此文原载于《财经》杂志2016年11月7日第30期

【读者来信】

郜熊谈冯克之误

《记忆》第153期有一篇陆凌写的谈大饥荒的文章，陆先生在注释中提到了冯克(Frank Dikötter)的《毛的大饥荒：中国最严重灾祸的历史，1958-1962》。(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Walker&Company, New York, 2011) 陆先生评论说：

“这本书是近年来有关大跃进和大饥荒的一部重要学术专著，香港也出了中译本。本书引用该书的内容，均出自原版英文。冯克严谨认真，所用的资料有些来自原始档案，有比较独到的分析，结论也是触目惊心的，……冯克采用了十个省级的档案馆资料（除外交部以外，其它中央档案极难看到），较其它同类研究有一定突破。但冯克并不讳言，由于中共对于档案的控制，许多关键信息依然无法接触，这本书所用资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软”。
[冯克，P341]

冯克大胆指出在1958-1962年，中国至少有四千五百万人死于非正常原因，而此前的估计是一千五百万到三千二百万之间。[冯克，P xii]他还认为采用“大饥荒”来统称这场灾祸有误导性，让人们感觉1958-1962年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只是不成熟的经济政策的“意

外的后果”。饥荒固然饿死很多人，但其中约有250万人是被虐杀的，约占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6-8%。伴随集体化的激进政策，“强制、恐怖及体制化的暴力是大跃进的基础。”[冯克，P xii-xiii]

冯克尖锐地指出，在毛所有的缺陷中，最严重的是他“对于生命损失的冷漠。”[冯克，P xv]1959年3月25日，毛在上海锦江宾馆的会议上提出，要征购粮食总产的三分之一，以保证兑现对国外的承诺。毛说，只要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就不会造反。粮食不够吃，就会饿死人。要想让一半人吃饱，只好让另一半人饿死。[冯克，P88，pp133-134]冯克在书中引用了毛刘周邓等中共领导人很多内部讲话，较为生动。”

我同意冯克所说的，毛最严重的缺陷是“对于生命损失的冷漠”。但是，我不得不告诉陆先生，冯克不点也不像他以为的那样“严谨认真”。他引用毛的话时，完全误解了毛的意思。把毛所说的工厂死（下马）一半，解释成了人饿死一半。中共中央的文件是这样写的：“汇报到要削掉一些项目时，小平同志插话：下马要血淋淋，今年计划才有保证，削少了，要研究这个问题。主席接着讲：搞工业不狠，搞那么多仁义道德，主要削地方，根本不要决心，砍掉就完了，根本不干，你搞不出来么，搞多了不行嘛！明年来个马鞍型，无马鞍型，怎么骑马？分散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方法，大家吃不饱，大家都死，还是死一半？人类年轻得很，只有150万年，何必那么忙？1078项搞得成，我赞成，搞不成，何必多搞？”（详见：<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3036>）

显而易见，毛在这里所说的“大家吃不饱，大家都死，还是死一半？”这里的大家指的是工厂，吃不饱指的是工厂所需的原材料。死指的下马。冯克把工厂变成了人。冯克是中国学专家，他应该知道，毛不管说话怎么云山雾罩，也不会赤裸裸地说，“要想让一半人吃饱，只好让另一半人饿死。”这类毫无人性的话。毛是哲学家，他深谙老庄所说的大奸若忠，大恶若善。■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行